



2012年1月31日创刊 2015年6月30日第54期（增刊）

本期目录

〔北京地质学院文革专辑〕

大事记

伏庆是 北京地质学院文化大革命大事记（提纲讨论稿）

友情链接

孟繁华、蔡新平、赵国柱、伏庆是、丁育民 有关编写北京地院文革史的通信

生逢乱世

程关林 被遗忘的群体

田春林 田春林回忆录（节选）

故纸堆

蔡新平 对一次戚本禹接见北京地院同学讲话的说明

戚本禹 接见北京地质学院东方红公社部分同学的讲话

〔北京地质学院文革专辑〕说明

在文化大革命前期的红卫兵造反运动中，北京地质学院是个很有特点的院校。在当时被称为首都红卫兵“五大领袖”的北大、清华、北师大、北航和地院中，唯有地院的“东方红”是中途换将（更换了主要负责人）。尽管如此，在中央文革的大力扶持下，地院“东方红”仍然大旗不倒，直到最后与全国造反派一齐被赶下文革舞台并统统打入另册，惨遭清算。近年来，原在地院经历过文革的校友中，抢救文革记忆、还原历史真相的讨论渐趋热烈，不少人已经从各自的角度写起了回忆录。这是可喜的现象。本刊特选发一组有关文稿以供关心者参阅，并盼更多的当年亲历者能加入到这个“抢救”行列中来。

本期文稿由蔡新平等先生热心提供，谨致谢忱。

【大事记】

北京地质学院文化大革命大事记

(提纲讨论稿)

伏庆是

作者简介：伏庆是，1944 年生于上海市，1963 年考入北京地质学院。1966 年 7、8 月间与朱成昭等人发起成立东方红战斗队，后发展为北京地质学院东方红公社，任公社办公室主任。1967 年 4 月起任北京地质学院革命委员会委员、革委会办公室主任。1968 年 5 月开始受审查。1969 年 6 月毕业分配至湖南省地质局下属地质队工作。1971 年再次受审查。1986 年结束审查，宣布“解脱”。2004 年在湖南省地质研究所退休。

序言

简要叙述北京地院概况、地院文革特征及其在全国文革中的地位和影响。

第一部分 发端

一、文革前的政治气候

阶级斗争和反修防修教育，活学活用毛著，毛绝对权威的形成

二、文革全面爆发

从评《海瑞罢官》到北大第一张大字报发表

三、院党委领导的文革

地院领导层的派系（三驾马车），院领导对运动的压制

四、“造反”与“保皇”两派观点的形成

第二部分 东方红时期

一、6·20 运动

工作队进院，工作队领导的文革，工作队扶植的院文革，李贵、王晷堂的演讲，6·20 运动爆发

二、反干扰

李人林讲话，薄一波批示，工作队对师生的迫害，师生的反抗

三、东方红公社诞生

朱成昭（爆破战斗队）的大字报，造反派的串联活动，东方红战斗队成立，16 条发表，从东方红战斗队到东方红公社，东方红公社成立宣言，公社组织特

征

四、四进地质部

一进地质部，肖力来地院，8·24 大辩论，二、三、四进地质部，联动和“斗、批、改”的活动

五、夺权

“一切权力归东方红”口号的提出，东方红食堂，夺广播台，吴德、王力宣布陈伯达批示，“斗批改”瓦解、东方红成为地院唯一群众组织，东方红内部分歧和“朱”、“蔡”两派观点的形成

六、创建首都三司

周永璋的串联活动，三司成立与演化过程，地院东方红在三司的地位和三司在文革中的作用与影响

七、大串联

大串联起因和地院大串联概况，东方红介入地方文革，上海联络站与“一月风暴”，西南联络站与抓彭德怀，河南联络站与二七公社，其他联络站或东方红人员介入地方的重大事件（如李全华之死等）。

八、朱成昭转向

朱成昭反文革观点的形成，朱成昭与叶向真，朱成昭的两次检查，朱成昭及其追随者的活动，二月逆流与朱成昭。

第三部分 革委会时期

一、东方红换代

1967 年 3 月 5 号戚本禹接见。戚要朱成昭闭门思过，推王大宾顶替朱成昭。指示周景芳帮助地院成立革委会。地质东方红“改朝换代”。

门头沟找肖力，王大宾成为东方红一把手，东方红革委会人选的产生与革委会筹建情况，孟繁华发表造反派大联合文章

二、东方红革委会成立

东方红革委会成立大会，革委会成员名单与分工，革委会组织机构，东方红革委会改名北京地院革委会

三、“天”、“地”之争

天、地两派形成，北大事件，民族宫事件，北京京剧二团事件及其他派性活动，北京市革委会成立

四、围困中南海

东方红批刘游行，揪刘火线的形成，东方红的参与

五、整党

革委会领导整党，王大宾、聂树人入党

六、反革委思潮

新东方红公社（含朱成昭出走、做检查、被捕等），二团（大批判广播台等）

七、清理阶级队伍与反右倾

陈家庚事件（陈与田春林受审），王鸿夫妇自杀，打倒高、安、郑

第四部分 军宣队时期

一、军宣队进院

二、东方红解散，革委会靠边，军宣队独揽大权

三、军宣队领导下的地院，走资派、造反派、地富反坏右再次被整

第五部分 尾声

一、学生全部离校后的地院

概要记叙 70 届学生毕业离校后地院教职工在“一打三反”、清查“五一六”、批林批孔、天安门“四五”运动等各项运动中的遭遇和学校南迁、要求返京等事项的情况

二、造反派的命运

主要造反派人物和典型人物（如何建勋等）离校后受审查情况

结语

主要造反派人物和典型人物在长期背负黑锅的状况下仍然在各自岗位上作出很大成绩及他们的思想状况

说明

一、此提纲所列各事项，大多是我本人未参与、不清楚的，因此必然有很多谬误和遗漏，各阶段的划分不一定准确，各部分之下的小标题也不是最终成文标题。所以此提纲纯属抛砖引玉，不仅需要补充修正，甚至可能推倒重来。

二、我在草拟提纲时，有以下几方面的考虑

（一）全国各地各单位的文革，基本都经历了造反与保皇之争、夺权、大联合（至少是表面的或短暂的联合）、成立革委会、军宣队或工宣队进驻、造反派最后挨整这样一个过程，地院也不例外。但是地院文革有以下特殊之处：

1. 地院文革是通天的，甚至可以说是毛直接介入的（通过肖力），朱成昭由造反转为反中央文革，也与上层有关（通过叶向真）。所以地院文革在很大程度

上直接反映了当时中国最高层的斗争。

2. 广泛介入了地方文革，在上海等地文革中起了重要作用，与各地文革有千丝万缕的联系。

3. 地院文革创造了几个第一

(1) 第一个以和平方式大规模示威游行（6·20）

(2) 第一个实现造反派大联合（东方红公社）

(3) 第一个进驻国家部级机关（四进地质部）

(4) 第一个提出夺权口号，第一个实现造反派掌权

(5) 第一个把矛头对准中央文革，提出系统的反文化革命观点（朱成昭的八大观点）

(6) 第一个提出大联合

(7) 在全国高校中第一个成立革委会

(8) 文革中第一个有外宾参观访问的高校

4. 地院造反派组织东方红与当时大多数造反组织和红卫兵有以下不同之处：

(1) 总体上采取巴黎公社式的大民主

(2) 反对血统论

(3) 没有破四旧，没有批斗地富反坏右和学术权威（个别的或个人行动及革委会成立后的行动除外）

(4) 没有发生武斗（个别人参与地方文革武斗除外）

(5) 内部虽然有激烈分歧（朱、蔡）但并未另立山头，有分歧，没分裂

我认为大事记要充分反映这些特殊之处，提纲中反映得还不够，所以希望诸位补充、润色。当然，这只是我个人的想法，若有不同意见，也请提出来。

（二）如今回想文革往事，我觉得文革中我们做的唯一有意义的事情就是要求工作队平反，要求政治上的解放。只有这件事才是为自己而做，其他都是为别人做嫁妆（之所以要求平反，也是因为给别人做嫁妆惹的祸）。在争取解放的斗争中，表现出的忘我精神，众志成城的精神，非凡的创造力，释放出的巨大能量，才是文革的精华所在，才是文革的闪光点。我希望地院文革史能突出这一点。当然，这也是我个人的想法，肯定会有不同意见，希望能提出来。

三、革委会成立后，东方红名存实亡，完全受革委会摆布，已失去自主能力。革委会唯上是从，主要做了以下几件事：一是忙于打派战，打派战的最终目的是扩大势力范围，增加筹码，以便在将要成立的北京市革委会中争得一席之地；二是巩固革委会的权力，恢复党组织，排斥不同意见；三是整人。所谓复课闹革命、教育改革等均无实质意义，所以在提纲中没提及。

四、军宣队进院后似乎就是整人，用的完全是文革初刘少奇工作队那一套，有过之无不及。轰轰烈烈的群众运动之后，又恢复原样，这就是文革。此时我早已被审查，具体情况不明，望知情者补充完善。

五、我认为文革之所以能发动起来，是毛事先做足了功课，也就是树立了他的绝对权威，所以才能一哄而起。所以在第一部分“发端”里专门有“文革前的政治气候”一节，为的是说明这一问题。

六、结语部分之所以讲述主要造反派人物和典型人物在长期背负黑锅的状况下仍然在各自岗位上作出很大成绩及他们的思想状况，寓意是这些人尽管饱受折腾，依然是国家的栋梁，如果不折腾他们，不是更好吗？

再强调一下，以上只是我个人不成熟的想法，务必批评指正，也可推倒重来。

问题

提纲草拟出来了，问题也随之而来。

一、首先，如果按这提纲和我在说明中的一些想法编写大事记，在内容的取舍上就会有明显的倾向性，并且带有一定的感情色彩，不知这样符合不符合“信史”的要求？也不知符合不符合老孟对“大事记”的要求？

二、其次，有了提纲，具体如何写，也是大问题。关键是如何把握“详”“略”的“度”。如果过于简略，只记述某年某月某日发生了什么事，就无法反映这件事的前因后果，就成了一笔流水账。如果把前因后果都讲清楚，那就会使篇幅很长，同时也会突破时间的顺序，那就不是大事记，而是地院文革通史了。

建议

针对上述问题，提出以下建议。

一、首先必须在兴趣圈内广泛征求对提纲的意见，然后根据各方意见或修改完善，或推倒重来，总之要尽快把提纲确定下来。

二、提纲确定下来后，按各部分、各阶段或各事项分工编写，兴趣圈的校友可自告奋勇要求写自己所熟知的部分，或积极提供有关材料。一个人是不可能完成这项工程的。

三、编写人尽可能按详细记叙的手法写，大家都写完后如果足够详细，就可作为地院文革通史，然后择其要点作为大事记附后。这样一举两得，既有了通史，又有了大事记。

通史及所附大事记，加上专题文章（如抓彭德怀专题、朱成昭专题、上海联

络站专题等)、个人回忆录及对文革的反思与评论文章,便构成了完整的地院文革史。

四、建议德瑜组织人员对已获取的资料做一清理,分门别类,提供给相关编写人员,从而加快编写速度。

【友情链接】

有关编写北京地院文革史的通信

孟繁华、蔡新平、赵国柱、伏庆是、丁育民

按:在北京地质学院亲历文革的一些校友,近来关于编写地院文革史的讨论十分热烈,除去电子邮件外,还有许多微信交流。这是从电子邮件通信中摘出的一小部分内容。

孟繁华致蔡新平

2015年3月14日 21:57 (星期六)

看了你和赵国柱的邮件,很高兴。赵对田、程、殷所写回忆的评论,我有同感,他提出的由你主笔、他们辅助写“二团史”的建议,我极表赞同。肯定有资料方面的欠缺,大家凑一凑。我这一次来海南,主要是录入我的日记、笔记,包括文革前的。不全,有断档,搞不清怎么回事了。但也有一些有意思的内容。比如四清,那个气氛,简直可以说是小文革的彩排。

去年8月和朱德瑜、曹敏九去看周永璋(你们好像不久前去过),在疗养院,他坐在床上,我坐在他旁边,说东道西,他忽然用右大拇指向着自己,又把手掌伸向我,又做出一个用筴篱旱地捞鱼的动作。都猜不出他打的什么哑谜,我们每猜一个,他都摇头,大声喊“不,不,不!”七猜八猜,大概过了五六分钟,他用右手连续做了四个动作:拇指自指,手掌推向我,指了指他老伴,收回手,打出一个“八”字形,我恍然有悟,喊道:“你是说,串联,你,我,她,吉让寿,还有北大的,共八个人?”他兴奋得不得了,大喊:“对,对,对!”声音比我们几个加起来都响,连隔着几个房间在楼道头聊天的人都说:“哎呀哦,怎么这样大声啊!”

赵国柱问我属于哪一派。2012年,几个人去看胡乐成(住北城某小区),四十年没见面了,我问他:“还认得我吗?”他说:“认得,孟繁华,蔡派!”一点不含糊。朱德瑜去看某老师(女,一时想不起名字了),提起我,老师说:“知道,

他不是二团的吗？”你看看，名声在外。以前都不知道我是这样被归派的。

1969 年，我一个交代材料中有一条，革委会想搞个政策研究室，由安静（注：即安静中，下同）和我负责，因杨雨中反对作罢。你知道，我没有参加过二团的任何活动。文革前期，和吉让寿接触较多，后期和张海涛接触较多。你们批判朱成昭的大字报贴出后，革委会内争论很厉害。我、张海涛、田春林曾经想三个人发表一个联合声明（声明的具体内容，没有记），被伏庆是劝止了。笔记：1966. “11.1 下午，到 13 人（学校、北京来扬州串联者），其中 3 女。晚 6:40，胡才（？）介绍家里（学校）的情况，主要是周永璋的问题，第三司令部给周莫须有‘野心家’‘阴谋家’的罪名给开除了。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在少数派内的反映。”

没有日记、笔记、交代材料，这些都忘了，百分之九十以上都忘了。材料录入了，比较乱，不少不相干的内容，待整理后给你看。

你说的文革回忆的那几个部分，基本就是那样。前几部分都是说史事的，这一部分比较麻烦，总得有所据。观点可以信口说，把麻烦事做了，再坐而论道，也没有负担了。

大事记部分，由伏庆是承担，他要用的材料，朱德瑜尽可能找到给他。这是那次在你家商定的，他建议分派任务，他本人乐意承担。田春林写朱成昭。你听力不好，这些内容你没有听到，现在告知。

赵国柱致蔡新平

2015-03-16 15:41:39

关于回忆录，我还想说几点。

1. 关于二团回忆录，你和孟繁华说的都在理，主要由你考虑，我都没意见。
2. 你提到要写几个人的专题，估计安静中老师的专题，将由濮老师和肖劲东主要执笔，一是他们更了解，二是他们笔锋尚健。不知江祖如老师的专题何人主要执笔？

3. 我问了孟繁华是那一派，因为他的特殊身份，但我个人觉得他应属蔡派，理由如下：

1) 二团主要是思想上的派别，我们主张凡思想理念上相近者，不管其是否与我们有组织上联系，也无论在文革那个阶段，都视为我们二团一派。

2) 比起掌权且拥有庞大组织系统的朱派，二团只有 8 条汉子，组织上没有发展过，而且是在野的，但当时我们就很自信也很自豪地指出在地院的每个系，每个部门，每个角落都有大量二团一派的同学，老师，干部和工人，事实证明也确实如此。

3) 孟繁华在文革早期与二团的吉让寿一起活动较多。1966 年 11 月周永璋被排挤出三司后，他与周、吉、邱、我及王秀允、陈姁等，包括北大的 1-2 位，还有北京卫校 2-3 个小女孩，去扬州和上海等地串联，我是亲历。可以说文革前期，他基本上与我们二团一起活动，直到出名后，被结合进革委会，接触、活动才减少，但我认为更重要的是在文革中他的思想理念与我们相近。

4. 据相似的理由，我反思是否把以张海涛、田春林、王振群、刘玉发等所谓革委会内“二团代理人”的一批同学、老师和干部也视为蔡派，应更合情理。

蔡新平致赵国柱

2015 年 3 月 16 19 时 04 分

其实当年学校要从观点来看，的确每个班，每个教研室，每个年级，每个系，都分为两派，在有的班、室，蔡派甚至占绝对多数，没有绝对的中间派。是一派的校友，多年后见面，自然而然地就是亲切些。倒是越往后才逐渐不太明显了，但感觉上和共同语言上还是有差别。那些年经常在地质系统出差，总能遇到我们的老校友，有的同学我不太认识，见面后他们往往主动说：“你不认识我，我可认识你，其实我也是蔡派的。”

因为我们没有拉队伍，“派”的认同完全是思想的，这更有意思。孟繁华，田春林，曹明久，包括伏庆是，都说自己其实是蔡派的，这么多年了，心目中还是这种认同，这的确很值得思考。我试着先从我自己的记忆开始，哪怕是一些片段，慢慢地写。写出一部分就发给大家，一起讨论。

孟繁华致蔡新平

2015 年 3 月 16 日 20:58 （星期一）

按赵国柱说法，蔡派可分狭义和广义两种。狭义就是二团组织，8 个人；广义是理念相近者，有多少人，恐怕就说不清楚了。朱德瑜看了从你那里转录回的“高、安及二团资料”，对曹敏九说：你和陈凤英参加了大批判联络站，是蔡派跑不了啦。此前，他还传给我从陈凤英日记中摘录的材料：“那时我们经常到安静中家去开会。我不是二团的成员，但对他们的一些观点是支持的。我记得周永璋被抓，他还写过一首诗。”周诗：“大河东去曲折多，革命道路更坎坷，高山难阻东流水，曲折能奈有志何？”殷惟侯回忆中，有这样一段话：“6·20 造反兵团和红色造反兵团在江祖如、安静中的撮合下、在反朱成昭的共同目标下走到了一起，互相影响、互相交融，最终成了风雨同舟的‘二团’，是地院松散的“蔡

派”的经常代言人。蔡派的真正核心应该是安静中、江祖如。”据你所知，这符合实际吗？他所说的蔡派，显然是广义的了。

你写自己的回忆外，二团的回忆恐怕只有你作了。有些逝去的个人，如高院长、安静、郑伯让、江祖如等，你能不能安排人写？安静有肖劲东的稿子，有底了，如濮老师写，可能会有更多的情节。我笔记中也有几个情节，都是和我直接有关的，怎么处理，再说。另几个人谁能写？我除写自己的内容，张海涛、吉让寿，我会写一点，还有一些内容，但肯定不全面。非正常死亡的李仲学，和古宝琳同班（《东方红报》的，也是我的朋友），她写了一篇了，我会再写一点。李明哲早期也是重要角色，清查中非正常死亡。宋志敏（李原夫人）写了一篇（写了两次），朱德瑜和曹敏九去看她，钱佩娟老师也去了，我觉得钱老师也应该写一篇江祖如老师的。就这样一点点地落实。

伏庆是致蔡新平等校友

2015年5月23日

同意新平关于地院文革史编写情况的武昌讨论纪要，尤其同意其中建立地院文革史兴趣校友圈和开门写史的建议。现将我草拟的大事记提纲及有关说明发送给诸位，希望得到兴趣圈校友们的指教，特别希望能看到繁华、德瑜、保军等老朋友们的意见。同时，也欢迎对编写地院文革史无兴趣、不参与，仅仅是对此提纲不满的朋友，提出意见或批驳。

蔡新平致田春林等校友

2015年5月23日（星期六） 中午 1:41

伏庆是的大事记提纲已经发过来了，和在武汉讨论的纪要一并发给各位校友。肖劲东的关于编写文革史的想法，还没收到，待收到后再转发。关于地院文革史的编写，请各位校友发表意见建议。

蔡新平致诸校友

2015年05月23日 21时17分

伏庆是的提纲是一个讨论稿，地院大事记还有很多内容没出现在他提纲里，正需要大家补充完善，比如说陶老师就提出关于学校教职员工文革中的种种情况，有多人被批斗，还有自杀死亡的等等，介入两派斗争的等等，提纲里就没有。

地院东方红对外活动是地院文革史的重要部分，希望大家提供资料。

老丁，如果能够根据你的日记加上你的回忆写一个“文革期间我在上海联络站的经历”或类似的标题的回忆录，那就更好了，将成为地院文革回忆录的重要部分。

我的想法就是大家写，尽可能多的校友参与。甚至逍遥派也应写“文革中我是逍遥派”，从逍遥派的角度看文革一定也很有意义。斗批改红卫兵的头，程关林，就写了回忆录，他的经历，他的视角，就令人耳目一新。在征求了作者意见后，我准备把几位已经写了的回忆录发给大家参考。

老丁，真的需要你出手啊！

丁育民致蔡新平

2015年05月23日 20:57

看了你转发的“大事记”，里面提到了上海联络站和“一月风暴”，当时我是上海联络站的办公室主任，亲历了那一段上海的许多事情，比如张春桥一到上海就派车接我到虹桥机场。又一起去安亭，等等。我当时的日记记得很清楚。但我想与你们要搞的记事关系不是很大，要否提供给你，请回示。

孟繁华致蔡新平

2015-05-24 10:30:16

看了纪要和提纲，很高兴。大家都在关心地院文革史，有紧迫感，提出了新的操作方式，其中两项最为突出：微信兴趣圈，开放式。以前主要是朱德瑜和我来做，有个简单的分工，前期资料征集主要朱负责，后期编写主要孟负责。故所有资料都汇集到朱处，然后分发有关人员（包括我）。我和朱有两千多封邮件，记录了我们的工作过程和想法。朱回京后，我们会做一个全面的总结，向各位师友汇报。

大事记详略，应先和整本书的体例——内容结构结合起来考虑。

邱心伟、原蜀育主编的《清华文革亲历——史料实录、大事日志》，除大事记，没有其他内容（不算文前的几篇读后感），所以叙述较细，有几天是按小时记载。

我设想的地院文革史体例不同于此，重要事件已有专述，故大事记可以比较简洁。

大事记，资料为王。不论繁简、详略，资料力求丰富、可靠，繁而后简，详

而后略。

不知诸位设想的体例结构是怎样的？

蔡新平致诸校友

2015 年 5 月 24 22 时 57 分

前面转发的孟繁华的两个关于编写大事记的文件。老孟和朱德瑜前期做了大量工作，伏庆是接手后是怎么衔接的？下面应当如何接续下去。开放式已经有老校友响应了，如丁育民答应从香港回来后马上动手写他的回忆录，他有日记。地院文革史，应当是全面的，工作队、校文革、斗批改，各方面的都应当反映，这就需要更广泛的宣传发动。问题是目前能够联系通讯地址有限，我这里并不全，才一百多人，希望相互补充介绍传递。我准备建一个校文革史博客，注册进入，对内开放，对外要允许后进入。不知技术上是否可行。

孟繁华致蔡新平

2015-05-26 11:43:28

我刚收到中学一语文老师写的回忆录。他 1924 年生人，2014 年 90 岁，在学生、同事的劝说下，动手写回忆录，花 4 个月时间，写了 7 万字，而且是在电脑上，一个字一个字打出来的。跟你说这事的目的是，我们有些同学，也不过 70 岁上下吧，还不能用或不愿用电脑打字，懒得把自己的一些记忆留下来，我想把这事告诉他们，不应该呀！70 岁学会了，活到 90 岁，能用 20 年，绝对值呀！更不用说上网、微信种种好处。我们校友圈子里，陶老师和你是最得心应手的了。我对软件、操作有很多不懂不会用的，觉得受到了限制，等把地院文革史这件事结束，我要好好进修一下。

丁育民的回馈令人鼓舞。联络站是我们的专题之一。对这个专题的设想是，概括联络站的情况，写几个重点联络站。上海联络站是我们确定的重点之一，站长姜涛，我和老朱都很熟，没来得及采访，去年（前年？）去世了。朱在上海联络站呆过，他负责这个内容，已收集一批材料，如丁育民有日记，最好了。我一直觉得，当时的文字材料，比会议更可靠，更有价值。一听说谁那里有传单，有日记，有照片，如获至宝，紧追不舍。我在海南几个月，基本都在录入日记、笔记。离开海南前，以为录入完了，回来又发现几本，还在录。我发现，九成内容，完全没有记忆。比如周永璋，我们一起去扬州串联是记得的，仅此而已。但日记中记载，到南京，到上海，在华东师大访聂元梓，都在一起。吉让寿不用说了。

有个“邱”字，没有名，邱世寿？不好妄猜了。还有我们班的其他人，北大的，扬州的，南京的，全无印象。如能通过微信兴趣网，发动更多的人参加，发现更多的原始材料，就是一个新局面了。

蔡新平致孟繁华

2015-05-26 19:03:02

老孟，你说“等把地院文革史这件事结束，我要好好进修一下。”恰好相反，计算机一般来讲只能边用边学，专门去学，大约 18 岁前还可以。你只有在用时发现你不明白的问题，或者问人，或者到网上查，然后自己去试，才可能有所长进。等你写完文革史，你也不用学了，那水平也就到顶了。因为剩下的岁数也快到头了。

老孟所举的 90 岁老人学用电脑写回忆的例子很好，陶老师更是榜样，各位动动笔，敲敲键盘，把虚拟记忆变成真实文字留下来，老年生活会增加一点有趣的乐趣。

我已经建了一个地院文革论坛，不叫“论坛”，没那么高大上，就是大家对地院文革史的问题交流思想，互相启发，讨论一些遇到的问题。于此无关的杂七杂八的内容，可以在地院老校友圈里发表传播。希望大家踊跃加入。凡是愿意的，直接把你手机号或微信号告诉我。

【生逢乱世】

被遗忘的群体

程关林

颂扬它时，说它是“反修防修”也好；批判它时，说它是“一场浩劫”也罢；但确是“史无前例”、“触及灵魂”。这，就是现在人们有意无意弄得谈虎色变的“文化大革命”，或曰文革。

连我自己也不明白，为什么在我想写一点走在祖国石油天然气产业最前列、理应感动中国的石油地质队员们的史实时，扯来扯去，动不动却跟文革挂上了钩？

《文化大革命的起源》的作者，哈佛大学教授罗德里克·麦克法考尔认为，对于文革，应该正视它而不是留下十年的历史空白。更为重要的是，不理解文革就无法理解改革开放。在哈佛，不少学生选修文革课程，而中国的年青一代，反

而对这一段虽然痛苦，却客观存在的历史茫然无知。

我想告诉年轻人，文革及其曾担纲其中主体的红卫兵，绝不是当今你们所见的电影、电视、文学作品中那样的无头脑的群氓以及只知挥舞皮带打砸抢的地痞的一幕闹剧，其深刻的社会背景，人们从茫然到醒悟的灵魂触动，是其它年代不可能有的。原来，我动笔的念想还是源于毛泽东、邓小平“实事求是”的教诲。而且，似乎与我有类同想法的同龄人还不在少数。因此，本文在朱德瑜老大哥下达征文启示一、二年前，基本上已完稿。

而今，不少当年的“造反派”在网上大书特书，一个“三司”司令问题就争得个不亦乐乎。却鲜有“老保”出来说几句话，当年的“老保”，或曰“保守派”、“保皇派”，成了被人遗忘的一个群体。

国外研究文革史的应当能收集到北京高校天、地两派各自出版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大事记”。虽各抒己见，但幕前大事基本有所反映，幕后活动可寻蛛丝马迹。“老保”由于迅速垮台，故不可能出此类记叙“战斗历程”的东西。然而，一个舞台，只有正面角色，没有反面角色，或者只有主角，没有配角，好像难以成戏。

其实，北京地质学院不仅造反派“东方红”、“毛泽东主义红卫兵”因“天、地”两派的“地派”而闻名，它的对立面——老保“斗批改兵团”、“红卫兵”，同样蛮有特色。本人作为“红卫兵”的发起人之一，为研究文革史的人们提供一个提纲式的回忆。讲一讲文革中一些较轻松的花絮，尤其是当时的心理活动。

1965年11月，姚文元《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发表，地院21643班某宿舍同学间有一次争辩，余久芎等认为，这是一场政治风暴的前兆。祝天惠等认为，是历史学界学术之争。这是我们上大学以来，同学间第一次针锋相对的不同政见的碰撞。平常我对问题的反映还是比较敏感的，此时却哑口无言。因为其间究竟哪一种观点正确，已超出我的认知范围。

1966年4、5月，辅导员赵永芳组织学生集体学习，批“三家村”——邓拓、吴晗、廖沫沙。

自从学习“九评”苏共中央公开信以后，誓做无产阶级革命事业接班人的信念已在我们脑中扎根，但中国政坛的风云，还是让我们无所措手足。

业务课停了，连篮球场都空荡荡的。同学之间议论并不多，大家都心事重重，一副忧国忧民的沉重。

1966年5月底还是6月1日，我班李昌平等贴出全校第一张炮轰院党委的大字报。包括我在内，我班大部分同学都在此大字报上签了名。逻辑是：北京市领导出了问题，与北京市委关系密切的院党委脱不了干系。院党委立即组织人马用大字报反击，后称“六三”反扑。

1966年6月上旬，以地质部副部长邹家尤为团长，政治部主任边固为副团长的工作组进驻地院。

6月17日，工作组宣布：高元贵停职反省！这可是捅了马蜂窝。“毛主席派来的”工作组显然低估了当了七、八年地院院长兼党委书记的高元贵在全院师生中的威望和号召力。即便是6月初炮轰院党委的大字报，矛头所向，也是聂克、周守成、刘普仑等人居多，针对高元贵的很少。

1966年6月20日，首都各高校先后莫名其妙地反对和驱赶工作组，地院周永璋等学生拿着李贵（院教辅处长，工农干部，造反派，后为革委会二把手）的破床单游行，后演变成反对和驱赶工作组的事件。

工作组才进校几天，就有人苦大仇深地反工作组，而且首都各高校几乎都统一在“6·20”，没有高位者摇羽毛扇，才怪！可惜至今仍无人坦陈。

我对院党委并无要去“打倒”的仇恨，工作组进院，引导大家联系：院党委→高教部蒋南翔→北京旧市委，我们也不知所以。对上级派来的工作组，更无深仇大恨。我茫茫然，每天在地院、航院、钢院、矿院等看大字报，认真地看、摘抄。我班蒋浩旋、黄凯生、朱冬梅等同学通宵达旦，写了汇报材料。清晨，专门去国务院接待站，咨询对反工作组及保工作组的看法。

6月，北京的初夏，正是柳絮纷飞的季节。北京地院贯穿东西向的柏油路，宽敞豁达，路两旁高耸的白杨，枝繁叶茂。往常晨起时，师生在路上跑步操练，傍晚，师生在路上漫步谈心。而今，铁丝绕过树干，粗野地将苇席固定在白杨之间，一层层的浆糊，一层层的大字报，铺天盖地，各抒政见。一个个都自以为最领会毛泽东思想，最紧跟党中央精神，一个个的聪明才智跃然于大字报字里行间，颇有“书生意气，挥斥方遒”，写写大字报，就能修身、治国、平天下的豪情。

我也是参与者，但更多的是忧心和迷茫。地院师生引以为豪的大马路、林荫道，留在我印象中的，却是：

白杨、柳絮、林荫道，
大鸣、大放、大字报；
浆糊、粘土、使劲造，
迷茫、盲从、瞎胡闹。

很长时间，闻着香喷喷的贴大字报用的浆糊，想着困难时期饥肠辘辘的情景，觉得不可思议。后来，一种红色的粘土代替了浆糊，心中略感平衡。写大字报的纸，一捆捆，一卷卷，每天不知耗费多少。真是家大业大啊！不过，闹革命么……孰是孰非，岂是我一个年刚19岁，从小在江南小镇长大的穷店员的儿子所能判断的——到底谁是在按毛主席他老人家的指示办事？

6月21日，到各院校看了一天大字报没看出个所以然的我，左思右想，决

定找工作组提意见，理论理论。邹家尤可能听到我在门口要见他，工作人员不让我进去的争吵声，开门让我进去。门一开，一位浓眉大眼、敦敦实实的人正跟邹部长告别。后知，此人叫胡守安，地院司机，曾经的小八路。

见到邹部长，一肚子准备好的话，不知从何说起。邹家尤给我倒了杯水：“别着急，有意见尽管提。”我对派到我们班的工作组成员不了解情况就指手划脚不感冒，对工作组一些做法有意见，但我又不同意赶工作组，因此，言词并不尖刻。邹部长从“四清”时毛主席就派工作组，他自己也作为工作组组长去陕西讲起，一直讲到“6·20”：“有意见可以提么，像你这样就很好，人民内部矛盾，不要采取过激行为，否则，易被别有用心的人利用。有意见，想不通，随时可来找我。”

祝天惠去清华还是北大，会见比他消息还灵通的高干子女“哥们儿”，回来后动员我保工作组。我欣然同意。此后，从参与者跨入积极参与者行列。并与胡守安、祝天惠、李唯宇等成为“东方红公社”实际上的对立面。虽然，地院只知文革时学生中之周永璋、朱成昭、蔡新平、蒋良朴、王大宾、殷惟侯、田春林、杨喻中，此后之王大宾、聂树人、孟繁华、田春林、朱德瑜、胡乐成等。

毕竟，高干子女们比我们要了解中央的意图——在政治运动中，在大是大非中，站错了队可是一辈子的政治生命——1957年的右派就是前车之鉴。

副部长胥光义带着薄一波副总理批示来地院，先开会。传达文件分三批：支持工作组的，中间态度的，反对工作组的。第一批人开会时，没人通知我。邹家尤看到在马路上张望的我，叫上我进了会场。我一看，我班已有几个同学在，他们是谁通知的，不清楚。

“反干扰”开始，我算“左派”，与班上反工作组的同学一起学习毛主席关于动机、效果的文章，无批斗现象。然而，虽说是批评、自我批评，但硬要反工作组的同学承认因“效果不好”，动机也说不上好，也是挺折磨人的。宋永坤就一直坚持：“我动机是好的。”后来干脆一声不吭，以示抗议。我们也无可奈何，毕竟都是同班同学。我也没忘记，湖北半工半读劳动，宋永坤被分在最艰苦的测量组。须知，在到处是悬崖陡壁的天柱山测绘地形地物，可不是闹着玩儿的！但他始终没叫过苦，也没炫耀过。

我与张聪贤等追查“6·20”的后台，从吉让寿、白美骞等 11621、11622 班学生追到安静中。我和张聪贤本是去调查安静中的，反被安静中一席话说得无言以对。

我和安静中素不相识，但久闻其大名。“安静中道路”的说法，地院人都知道，他是地院团委书记，28岁就当了院党委委员。我来自傲，可在安静中面前，有一种高山仰止之感。1967年后，多次与他（我们都已叫他“安静”）、小濮（大家这么叫濮大姐）交谈，听安静一席话总能解我之疑，解我之惑。与安静

只要见面，当晚必定聊至达旦。

由于有余久芾、黄凯生两个“大个子叔叔”，我只能被安、濮的长子安天剑称为“小个子叔叔”。

在追查“6·20”后台的过程中，江祖如老师进入了我们的视线。参加了地质系对江祖如的批判会，接触了几次，“又臭又硬”是江老师留给我们的印象。

8月中下旬的一天，我在学校马路上见江祖如骑车而停，周永璋从江手中接过自行车骑上，急匆匆而去。我骂了句：“又他妈搞反革命串联去了。”江瞪了我一眼，没理我。当后来我与“二团”一起反“左”时才知，周永璋那时正为成立“三司”而奔忙。

江祖如爱人钱佩娟大姐也是位女中豪杰，后来为地院校友会没少出力。我2008年前曾是校友会新疆分会的会长，再加上江老师的关系，凡到北京，必去安静中、江祖如家。

1966年7月底，工作组撤走前夕，祝天惠、王秀英、程秀梅和我，应邀列席地质部党组会议。何长工主持会议，旷伏兆、胥光义、邹家尤、边固等与会。还有的人，是否有宋应、李轩，不认识。李四光部长为何未到会，也不清楚。王秀英哭着问何部长：“工作组为什么要撤走？”4个学生中，3个高干子女，就我老爸是平民百姓。我并不自卑，但由于不懂礼数，只能聚神聆听。何部长长叹一声：“我也是最近才知道，派工作组时，毛主席不在北京！”我明白了，这是一次向保工作组的学生的打招呼会议。

工作组进地院后，口口声声称自己是“毛主席派来的”，听何部长这一说，我都懵了。也是从那时开始，隐约间感到，毛主席与刘主席好像对文化大革命意见不一样？

7月底，8月初，我与祝天惠等人在北五楼前贴出大字报《全院红五类子女团结起来，积极参加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反、保工作组的许多“红五类”子女都签了名。如朱成昭、聂树人、王大宾、田春林等。其中，我与聂树人熟识，因我是院文学社社员，聂是院文学社副社长，挺器重我，经常指点我写作。认识田春林是在篮球场，他是校队的（我也爱打球，但1968年才进校队）。

1966年8月4日，我和祝天惠发起，与张聪贤、黄凯生、王锡金、武玉印、陈生宝、王秀英、程秀梅等成立“北京地质学院红卫兵”，并在学九楼西墙贴出《宣言》。《宣言》由我起草，祝天惠修改定稿，黄凯生用漂亮的宋体字书写。因在此《宣言》中，我们保工作组的态度鲜明，我又是第一个在上面签的名，所以后来各“老保”战斗队找我们“红卫兵”串联时，都是找我。

我们这一“红卫兵”组织，在北京高校乃至一些中学里，在全国，都可算得上是“老红卫兵”。

继我们“红卫兵”之后，李维宇、王庆山（后为程秀梅丈夫，两口子分配到甘肃白银市某矿山）等人随即在水文系成立“八一”战斗队，其骨干是军人子女，广播台的李绥胜（后为李维宇夫人，两口子1968年辍学去301医院从军，再转业到广州市）是其一员。他们在广场给学校右派剃阴阳头的举措轰动全院。对此，我大不以为然。李维宇对我的劝告回答：“你太右！”后李维宇去一司任后勤部长（一司是司令值班制），走前郑重地对我说：“我去跟兄弟院校打交道，院内的事就靠你们了。”

8月上旬，胡守安叫上我，从木工厂后院挖出一包东西，我一看，是“反动学生朱成昭”及“反动学生蔡新平”的材料。转移到何处，还是销毁了，我没过问。我只是明白，工作组确实整了学生的黑材料，但我见到的也就是这两个人。

1966年8月中旬，勘探系红卫兵（程关林）、水文系八一队（李维宇、王庆山）、物探系红旗（王洪超、王震亚）、地质系红星（毛炎超）、探工系火炬（苏椿）、研究生造反队（刘益康）以及工人赤卫队（胡守安、刘强）等人在院木工厂召开联席会议，商量成立“斗批改兵团”和其中的红五类子女并入我们勘探系红卫兵，扩充为北京地质学院红卫兵等事宜。我们勘探系红卫兵办公的南翼楼也成了红卫兵总部。当时议定，以与会各组织的头头为主，成立总部。

这个全地院的“红卫兵”算是8月21日成立的，有第一期“红卫兵报”为证（我未收集到第二期“红卫兵报”，可能就出了一期）。但它一成立就背离了木工厂联席会议精神，是个松散组织，背后仍是工作组时的文革小组。一些人，既要揽权当官，又不愿冲锋陷阵，更不敢出头办事。各战斗队也互相不服。

而能调动人员与“东方红”的行动相抗衡的，也就是工人赤卫队和勘探系“红卫兵”、水文系“八一”、物探系“红旗”等战斗小队。去经委、工交口、地质部保老干部，去《红旗》杂志社辩论……大部分有可能被人“秋后算账”的重大任务都是由胡守安与我互相通知，由“工人赤卫队”及少数红卫兵骨干执行。

勘探系“红卫兵”与水文系“八一”关系最铁，我那时穿的军装，系的皮带，背的挎包，都是李维宇、王庆山他们送的。研究生“造反队”的商锡钧、刘益康等以出谋划策为主。

对商锡钧、任士田这些学长，我和祝天惠很尊重，但互不干预。对另一总部成员王××，则不太感冒。

8月18日晚，北航红卫兵二男（似乎叫李明清、赖锐锐）二女专程到地院找到我和祝天惠，问道：“今天毛主席接见红卫兵，你们为什么没去？”我们说：“没人通知我们。”“太遗憾了，主席跟我们握了手，还照了相。”说完，向我们伸出手来：

“握握我们今天跟毛主席握过的手吧！”

8月24日晚，地院操场西头搭了个台子，造反派、老保两派大辩论。中央派陶鲁笏主持会议，自然居中而坐。他右边是代表我方上主席台的任士田（斗批改）、程关林（红卫兵）、胡守安（工人赤卫队）；陶鲁笏左边是对方代表：朱成昭、蔡新平、蔡文怀（？）。这也是地院文革中唯一的两派同台亮相。

蔡新平振振有词地引用中央文革一个又一个最近讲话，但很快被我方几千人的嘘声所淹没。这时，朱成昭神情肃穆地起头：“暮色苍茫看劲松……”“东方红”几千人齐呼：“……无限风光在险峰！”上万人的操场笼罩在一种哀兵动人的气氛中。

我在辩论开始前还跟蔡新平就主席台名额、辩论次序等争得面红耳赤，此时，我颇有理亏心虚之感。

震惊北京的地院“8·24”大辩论以我方大败而告终。当晚，我派不少人就宣布退出红卫兵（或斗批改）。我方辩论组组长谷尚（上？）礼、副组长王××也被撤换。可以说，“8·24”大辩论后，院红卫兵已名存实亡，坚持的只是勘探系“红卫兵”等各系保守派战斗小队及工人赤卫队。

奇怪的是，一直支持我们，这次又主持辩论会的陶鲁笏，在辩论会前还热情与我方代表握手，还拍拍我肩膀。而当双方正辩论时，一个秘书模样的人向他递了张纸条后，他一下就如同泄了气的皮球，对“东方红”代表唯唯诺诺，低声下气。

8月25日凌晨，我正为陶鲁笏在辩论会上表态支持“东方红”而恼火，祝天惠来电话，说陶鲁笏、李人林要接见祝、程等人。我正生着陶鲁笏的气，未去。一个多小时后，祝天惠敲开我的门：“国务院工交口是支持我们的，会上表态只是一种策略，因为中央文革的也到了辩论会现场。今后调子要变……”

我方按此调，回避工作组问题，强调向前看，革命学生团结起来，共同搞好评院内斗批改。此举收效，一批人宣布退出“东方红”。但大家已明白，以陈伯达、康生、江青为首的中央文革是支持“东方红”的，所以大局已难以挽回。由于周荣鑫曾向胡守安和我面授机宜，所以我底气还是很足的。

院内失势，“东方红”将矛头指向地质部。

“东方红”几进地质部静坐示威，直至绝食。我带人去地质部，担任保卫地质部总指挥（边固任副总指挥）。一个多月，我睡在部传达室长凳上，盖着我二姐夫给我的旧棉大衣。有时还得回校。来回串，或车接送，或步行。亢奋的激情下，人并不觉得累，反而感到有了“用武之地”。动力是：井冈山朱、毛会师，还是何长工当的联络员；王佐还是何长工去收编的；留法时，何长工还是周恩来所在党小组的组长……我们保的，正是何长工为党组书记的地质部。

“东方红”一进、二进地质部，也是哀兵动人，声势很大。祝天惠、王秀英

等不太放心，多次打电话询问。我对祝天惠说：“你们抓好院内的斗、批、改，就是对我们的最大支持。”“东方红”几次揪斗何长工、邹家尤等，都被我带人抢了回来。

保卫地质部的主力军其实是名噪一时的中学生红卫兵——西城区纠察队。对于我们红卫兵中的少数人向“西纠”提供在静坐的“东方红”人员中出身“不好”的同学的姓名，由中学生对他们辱骂的做法，我并不同意，但作为总指挥，又不便公然反对，只能持保留态度，否则，又是“右”。

对于“‘东方红’，脸皮厚，原子弹，打不透”之类的辱骂，我认为也属下三滥，没什么水平。倒是形容“逍遥派”、“骑墙派”的圆滑——“曲率半径处处相等，磨擦系数点点为零”的对联，还觉得有点意思。至于“老子英雄儿好汉，老子反动儿混蛋。要是革命你就站过来，要是不革命，就滚他妈的蛋！”纯属地痞语言，我从不附和。

反正在这期间，“东方红”到处去造，我们跟着到处去保，仅国家经委就去了几次。对方显然有高人指点，我们每次行动都落后一步，但总算未让那些革命元勋受到冲击——在我们组织还未垮台时。

8月下旬（？），“东方红”批斗邹家尤，我和胡守安带红卫兵、工人赤卫队将邹部长救出，藏在西三楼。邹衬衣血迹斑斑。

与邹部长 1966 年 9 月在地质部分手后，再次见到他，是 1973 年初。那天，我在地质部招待所办理住国务院招待所证明，见一熟悉的中年人在院子里扫地，这不是邹家尤吗？我连忙上去问好。邹部长很激动，没说话，拉着我去他家——招待所后院的小二楼。并见到了邹的夫人，原地质部石海局财务处长姜坤。

提起姜坤，部石油地质海洋地质局的老同志都用“干练、豪爽”来形容。我见她时——一个被造反派折磨得神志不太正常的老女人。姜坤半倚在床上，听完邹的介绍后，无神的双眼泪光闪闪，握住我的手，热情地问这问那。由于病中的姜坤盼望有人跟她聊天、讲故事，我又不常在北京，所以征得邹同意，我带博学多才，又善于表达的常江见了邹、姜。几个幽默的政治笑话一讲，常江也成了受姜坤欢迎的人。邹部长说：“她对谁都不愿理，难得跟你们俩这么谈得来。你们以后可要常来啊！”

我远在青海、新疆，也就趁出差到北京看看他们。常江倒是经常去问寒问暖，跟他们聊天解闷。

我已经记不得去过邹部长家多少次了。只记得 1976 年底，邹部长托人从北京给我带了封信来。信中言及，他已重新工作，问我想不想调北京。我回信深表感谢，同时示意，要自己闯道。

八十年代初的一次，还是在西单皮库胡同地质部招待所后院，邹部长家。姜

坤精神比原来好多了。见我后，拿出一大叠照片，问我认不认得照片上的人。我仔细地看了看，全都是记录地院“东方红”造反史的。几进地质部，抢广播台，揪斗老干部，示威游行——上面许多人我是认识的，但我不可能指认谁谁谁。也不知是谁居然把这些东西提供给邹部长等人，让他们“秋后算账”。邹家尤比较大度：“小程，别听你姜姨的。”并对姜说：“那时他们才多大？”姜不服：“里面还有不少造反派老师，可不是学生娃。”邹摇了摇头：“当年这些事，又有谁说得清楚。好歹我们没被整死，能活着看到粉碎‘四人帮’，你我就知足吧，别为难小程了。”邹要带我去看望何部长，我说：“跟何部长不太熟，算了。”现在想起来，挺后悔。

邹部长离休搬到复兴门部长楼时，姜处长已病逝。我最后一次见邹部长，是1993年12月。我和常江去看望因患癌症在家养病的邹部长。我特地叮嘱常江：“这么多年，我们也没跟邹部长合个影。这次，你务必带上照相机。”现在我保留的我和常江、邹部长、邹部长后娶的夫人的几张照片，就是那次拍的。邹部长很瘦，但精神还好。饭后，边喝茶边聊天。邹部长说：“去年，我到武汉参加了北京地院40年校庆，很受感动。希望中国地大能发扬北京地院的好校风，培养出一批又一批具有为地质事业献身精神的优质人才。”

我和邹部长相交二十多年，他对地院造反派，从来是谅解、谅解再谅解。真正革命者的胸怀。

由于“十六条”中有关破除“四旧”的号召，以中学生为主体，北京街头改路名，砸招牌，谓之“扫四旧，立四新”，党报又表支持，一时声势浩大。

8月上旬，我们红卫兵刚在南翼楼安营扎寨，就有人来报告：地院附中红卫兵到院图书馆“扫四旧”去了。我急忙带人去图书馆。沿途，一堆堆的书冒着一股股浓烟。我心疼、恼怒，因我爱书、惜书，家贫又买不起贵的书：“他妈的，这不是焚书……”赶到图书馆，馆方老师们正阻拦着那些不知高低的中学生，眼看挡不住了。我们一去，形势大变。我把领头的附中学生叫到一边，亮明我的身份、观点，他带人撤走了。我跟图书馆领导商议，象征性地烧一点本该卖给收破烂的书刊之类就行了。此后多年，我一直是图书馆的上宾。

1966年8月21日，院红卫兵成立后，就宣布扫四旧、抄家。我是8月20日从祝天惠那里得知此事的。闻讯后，与祝天惠连夜通知一些教授，让他们有个准备。后来赵鹏大家的高跟鞋（安娜的）、周守成家的美人照片等，都是我叫人退还给他们的。

说起以扫四旧为名义，对所谓“走资派”、“反动学术权威”进行的违法抄家，多说几句。因为我毕竟了解一些情况。

抄家是由北京中学红卫兵掀起，从而席卷北京，乃至全国的。

“抄家”，在北京地院是谁提议、谁组织安排的，反正我不清楚，也就是说，至少是背着我和胡守安等人决定的。这当然与“斗批改”兵团与红卫兵的组织建制有关。多中心，各山头谁也指挥不了谁。祝天惠和我在这个问题上的观点，与“东方红”一致——“死老虎”，有什么可打的？作秀（现代词）！

当时胡守安和我直接听从国务院、工交口、地质部领导指示，实际在指挥两派斗争中我方被动应付的多，所以对“抄家”之类事情，也不太过问。是情况所迫，才不得不过问的。

抄家的第二天，我照例去南翼楼上班，走廊里，几间原先空闲的教室堆满了沙发、弹簧床垫、高跟鞋之类“四旧”物资。也没人张罗、登记。见到任士田，我问他：“怎么回事？”他反问：“你也是总部头头，怎么问我？要不你帮助管管。”于是，我自命为“造反办公室”主任，任命恰巧在我办公室的地质系 69 届的任金龙（浙江人，戴眼镜）为副主任，工作人员就物探系的平文田。叫了几个人，将走廊里堆放的东西全部搬到教室内。

一接手，发现状况比我预计的好得多。首先，抄家时，基本上由被抄者所属单位的红卫兵负责，即有组织；其次，抄走的东西全作了登记，一式复写三份，被抄者、去抄者各持一份，交红卫兵总部一份，且有双方签名，即已备案；此外，绝大部分抄来的“四旧”存放在“教工之家”，准备在那里办“红卫兵革命造反展览”。

我是这样安排的：凡列入清单的物品，均在总部登记，由我负责登记在一本蓝封面、土黄色纸页的“保密本”上（困难时期印制的本子）；任金龙去“教工之家”，持总部那份清单，负责登记查对准备在那里展出的人员（我记得有冯景兰、袁复礼、杨遵义等）的物资，并筹备展览，对展出物品负责；平文田督办：金银首饰等贵重物品、反动物证、现金等必须在三天内查清，务必账物相符；总部（即我处）只保留登记本，其余物品（沙发及床垫除外）均移交“教工之家”任金龙处。可以说，当时核对全部账物相符。

在“红卫兵革命造反展览”展出时，贵重物品还全部与我登记本上记载的相符，至于后来，我就不清楚了。

凭心而论，1966 年 8 月，“红卫兵革命造反展览”的“前言”和“不结束语”还是十分精彩的。作者是常江，满族人，本姓成，物探系 61 届，地院广播电台台长、院文学社副社长。其诗词在地院颇有名气，时而上台即兴朗诵一首，掌声四座。我在院文学社里，也攻诗词，挺崇拜他。然而，有缘结识常江，友谊至今不变，是缘于我找“不结束语”的作者。

我问他，为什么将“结束语”写成“不结束语”？常江得意地回答：“革命尚未成功！”后来，在北京和全国各地，出现不少“不结束语”，是否由此而来，

谁是首创？不得而知。

地院“东方红”到国家经委造反，我带人去保护薄一波，常江在其中。我带人去红旗杂志社，与关锋、戚本禹辩论，常江在其中……

我毕业后分到青海，很快联系上在湟源县青海地质局物探队工作的常江。在青海，同搞物探，我借工作之便，去湟源物探队看过常江多次，他也到平安驿看过我和杨明英几次。常江夫人也是 68 年北京支边青年。只要我到北京，除了安静中家，常江家是我必须在那里借宿的。常江调回北京前，在北京住在象前街。

抓“五一六”时，正赶上我去湟源。一进院子，常江家周围贴满了标语和大字报，无非是该打倒常江这个“五一六分子”。我不管那一套，径直走进常江家。在门口，我对围观的人说：“文化大革命八张纸一个字的标语，哥们都没害怕过，这小阵势，吓唬谁？！”就在那一次，我对常江说：“你的近作（油印的）已经拜读，就‘庐山颂’中‘放眼大江东去，昂首万里云天’一句，有气势。”此诗后来普得好评。

常江调回北京地院后，专攻楹联，而且一发不可收拾。专著出了不少，还是我国楹联协会秘书长、作协会员。逢年过节还经常在电视上就楹联而露露面，俨然成了中国楹联大家。

1966 年 8 月 21 日地院统一组织的抄家，我没参与，却在红卫兵总部一些学长的忽悠下，冒全院之大不韪，于 8 月 23 日带人去了市里高院长家。结果是一张纸片也没抄来。“老运动员”高元贵早把跟高教部等有关材料付之一炬。一无所获的我问高元贵：“怎么回事？”高直言不讳：“等你们来，我早处理掉了。”此后，不仅与高院长成了忘年交，还多次得到他的教诲。

那时，地院党委陷于瘫痪状态，对群众运动毫无惧色的是高元贵。高院长曾指着马路两旁的大字报对我说：“‘一二·九’运动时，我就负责游行队伍的车辆调动。”我只能自叹不如。

而此后当我重提“抄家”这件往事时，高院长说：“你想想，我 18 岁就搞地下工作了，跟你文革时年龄差不多。能让你们从我这里抓到北京市委、高教部的把柄吗？”

高院长有两次谈话，我记忆犹新。

一次是 1969 年 5 月的一天，珍宝岛事件不久，我去西三楼高院长宿舍。高院长正看着报纸，抽着烟。屋内，一桌、一木椅、一木床、一方凳，简得不能再简。高见我，指指方凳，示意我坐下。将桌上的“飞马”烟、火柴往我跟前一推，示意我抽烟。没等我开口，高院长便道：“不用你说，肯定是问我对珍宝岛事件的看法。”我惊讶地点点头。高轻轻地咳了咳，吸了口烟，如同在向全院师生作形势报告：“中苏珍宝岛之战，不会引发两国大规模战争，世界冲突的焦点在欧

洲和中东，是美苏之争。战争是政治的继续，国际经济利益是政治的基础。中国也是同样，别看现在乱，也必将由大乱走向大治。”

1983年春节过后，去铁狮子胡同15号探望多年未见的高院长。一见我，他就关心地问我：“在单位上有没有因为学校（文革中）的事受到冲击？”我说：“没有。”“那就好，那就好。我当地质部顾问后，已给不少受文革株连的单位的单位去了函……”询问了我在毕业后的经历，又嘱咐我：“如有人找麻烦”，尽管找他这个院长。

话锋一转，他说：“你们这批学生中这次可能有人能当副部长。”又问我：“××文革中是哪一派的？”我一时想不起来，高提示：“跟商锡钧一个班的。”我马上联想到文革中的往事：“他跟我和商锡钧、刘益康一派，百分之百‘老保’。我担保！”“这我就放心了。”高院长挺高兴，跟我解释了一下：“有人在×××进部党组时就不放心，怕他是‘东方红’造反派。”

临别前，高院长说了一番当时令我莫名其妙，却使我后来走上经济管理之路的良言：“你应该学点政治经济学。地质部门要有一批懂经济的专家。地质事业要兴旺发达，离不开政治经济学。”我1989～1991年在南开大学攻读政治经济学，并以平均成绩93分毕业，受到蒋承崧副部长接见专谈，未辜负高院长期望。

那次离开高院长家，才想起，1976年2月，我在北京见到了安静中和濮大姐。安静曾告诉我，高院长1975年参加了周总理抱病在景山召开的部分老同志会议，这是继邓小平复出后，总理所作的又一战略部署。……我应该问一问具体情况。可惜，安静中、高元贵两位人杰已成鬼雄，再也问不成了。

文革初期，我与“东方红”头头打交道最多的是蔡新平。1966年8～9月，我与蔡新平有过多次交锋。

一次是他向我们红卫兵借广播器材，居然有人借给了他。也有人当即向我报告了。我赶过去，蔡新平已走。我一问，连借条都未打！我顾不上内斗，急忙带人赶到教三（四？）楼“东方红”总部，找蔡新平理论。他道理比我还充分：“都是地院的群众组织，都是国家的财产，凭什么你们占了院广播台，我们连一个话筒都没有？”我说：“不管你怎么说，借东西总得打个借条吧？”他避而不答，自信地说：“等革命胜利后加倍还给你们。”

另一次是我接到“东方红”内部线报：王大来老师已回到地院，就躲在教五楼地下室。凌晨2～3时，我带人悄悄地从南翼楼赶到近在咫尺的教五楼。地下室的铁门紧闭着。我们一敲门，隐约间可听到里面有杂乱的响声。敲了一阵，蔡新平出来了。“又是你”蔡新平见我没什么好话。“怎么啦！你们‘东方红’窝藏北京旧市委的黑典型王大来，还有理了？”我理直气壮。蔡新平略有点慌乱，但迅即

来了一句：“谁说的？”“这你就别管了。”我感到已打中蔡新平的要害，看他怎么狡辩。见我们硬要往里闯，蔡新平急了：“你们有没有搜查令？！”那时，谁想到，又怎么能办到搜查令？但“老保”是讲国法、政策的，明知王大来就在里面，也只得打道回府。

第三次，“东方红”在地质部闹腾未果，无奈之下，宣布绝食。我在那里保卫地质部，当然知道他们是在向中央施加压力，并无当年革命烈士在国民党监狱绝食的境界。所以，我令人从地质部食堂抬来两筐热气腾腾的白面馒头，几个人分头劝说“东方红”的同学吃饭。眼看我们有所收效，刚刚赶到的蔡新平急了，他站到凳子上，张开双手吼叫：“大家不要上当！我们绝食的革命行动已经得到中央文革的重视和肯定！”他接着讲了中央文革是支持他们的三条指示，不仅重新鼓起了“东方红”同学的士气，我方顿觉：“这下完了。”

后来，蔡新平与牛彩茹结婚后，我在北京“全聚德”贺请他们，曾向嫂子牛彩茹讲了文革中与蔡打交道，领教蔡诡辩技巧的趣闻——我的话是：“九头鸟，狡猾狡猾的。”

1966年9月，“东方红”由田春林带队抢广播台，我和刘志强带红卫兵、工人赤卫队护卫广播台。“东方红”的人还拍了不少照片。一位木工厂的工人告诉我，我说：“不管他。”我们人多，把他们的人一个个“请”了出去。双方都未打斗——北京地院文革中自始至终未发生两派武斗。

鉴于斗批改、红卫兵组织涣散，战斗力差，我和胡守安等商议成立了“北京地质学院工人赤卫队、红卫兵联合指挥部”，胡任总指挥，我和刘志强任副总指挥。这些，都已无济于事。

1966年10月3日，《人民日报》转载《红旗》杂志社第13期社论《在毛泽东思想的大路上前进》。文章明确地提出“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存在并宣告其破产。老保组织作鸟兽散。我们红卫兵总部连带广播台坚持到最后——1966年12月的，也就是红卫兵发起人之一，我班的张聪贤。这位共产党淮阴地区游击大队长的儿子，就是有这么股倔劲。

当时首都并存三个红卫兵司令部，首都一司叫“首都大专院校红卫兵司令部”，成立最早，老保与造反派红卫兵各占一半，中央还派了刘志坚当一司的辅导员；首都二司叫“首都大专院校红卫兵总部”，除北航红旗外，全部是老保；首都三司很狂，名叫“首都大专院校红卫兵革命造反总司令部”，全部是造反派。成立时，二司人最多，一司次之，三司人最少。

对《红旗》13期社论，占首都红卫兵70%以上的“老保”们，想不通，不服气。我们这些学生，怎么能清楚中央两派之间的斗争？怎么能清楚保护中央各部委领导反而站在了“资产阶级反动路线”一边？一心保卫毛主席的红色卫兵怎

么会站在毛主席革命路线的对立面了？一切的一切，无人解释，无法想通。

10月3日晚，我带北京地院20名红卫兵，会同北航21名红卫兵，赶往《红旗》杂志社，找关锋、戚本禹辩论。关锋、戚本禹在《红旗》杂志社大院里接见了我们。同时被接见的地院“东方红”和北航“红旗”的人数，远远超过我们。瘦瘦的小个子关锋没讲话，胖胖的大个子戚本禹先吹嘘一通关锋是个马列主义理论水平如何如何高的延安老革命，又讲了一番毛主席对文化大革命的指示，并向我们伸出橄榄枝：受蒙蔽无罪，反戈一击有功——造反不分先后。物探系一位姓李的女同学当场哭着向戚本禹认错，戚热情地握着她的手：“好，好，欢迎，欢迎。”我们无精打采地败走。

10月4日晚，我们红卫兵在大食堂召开大会。×××代表研究生造反队发言，犀利地抨击关锋、戚本禹。北航红卫兵最高指示宣传队演出“大海航行靠舵手”、“拿起笔，作刀枪”等节目。专门给我们助威、打气。后北京地院红卫兵也成立了最高指示宣传队。我记得有李克昌、庞国智等。

庞国智，探工系64届，系篮球队的，在校就认识，毕业后分到青海地质局13地质队。夫人张梅霞，物探系70届，毕业后改名张梅。对张梅霞的印象源于此：1966年8月，她跟物探系一姓詹的男同学找到我的办公室，张气冲冲地指着詹同学说：“他们在袁复礼家抄家时，违反‘三大纪律八项注意’，吃了袁家的咸鸭蛋，你当头头的看怎么处理。”这情况，在那时算严重问题。我反问张梅霞：“你是战斗队长，你的意见呢？”张说：“我和詹都是党员，回去开个党小组会，看他检查态度再说。”我当时连团员都不是，难置可否。

上世纪七十年代，算上我和杨明英、李小栓，同分在地质部第一普查大队、文革中稍有名气的同学还有范如松、王怀恩、何定一、叶留生等。与我所在321分队毗邻的13地质队，除庞国智、张梅，还有刘文德、肖文波、雷世泰、赵小燕等。加上李珍、常江等，连同其他院校毕业的安义中、林伟、郑芷萍、王鹤、金传谋、王嘉斌、李太成、陈起群、杨凯……人才荟萃。

这些有正义感的热血青年，在“四人帮”未垮台前那几年动荡的政治风云中，在雷世泰、赵小燕及我和杨明英家经常聚会。那时，不分你原来是那一派，都痛恨“四人帮”的倒行逆施，崇敬我们的好总理周恩来……地院乒乓球队的肖文波一到我家，什么话都敢说，但总要先敲敲墙壁，生怕隔墙有耳：“还是小心点好，王来昇（勘探系63届，也在13队）一帮人正追查‘政治谣言’，听说重点就是你们和雷世泰家。”

而肖体休、郑碧玉、刘若君、我和杨明英等人还戏剧性地在青海省会西宁市聚了一次。肖体休说：“难得我们朱派、蔡派，‘东方红’、‘斗批改’的聚在一起，为大团结，以茶代酒，干杯！”在大家都抢着买单时，郑碧玉霸道地说：“谁也不

要争，谁工资高谁请客。”于是由在青海最艰苦地区工作，工资也高的郑碧玉、刘若君买了单。

大文豪常江老兄一来，雷世泰、安义中齐聚我家，我们4个学理工，却酷爱国学的在一起，饮酒作诗，严循平仄韵律，一人一句，其乐无穷。但更多的还是不忘家事、国事、天下事。

1966年10月5日，祝天惠、我、张伟堂、杨根源、刘锡生、闫素斋、张东亮、迟双元等成立“棱角”战斗队。战斗队宣言由祝天惠起草，我修改定稿，张伟堂书写。大字报矛头直指中央文革。闫素斋曾在我的办公室气愤地斥责江青：“说这个是阴谋家，那个是野心家，我看她才是睡在毛主席身边的赫鲁晓夫！”我和祝天惠听了后，心里是赞同的，她只是说了许多人想说而不敢说的话。

针对“棱角”战斗队，“东方红”马上出来个“锉刀”战斗队——锉掉你棱角；我方立马出来个“铁锤”战斗队——砸烂你这把锉刀；对方又出来个“铸工”战斗队——铸化铁锤……

那时，“东方红”已从“哀兵”成为扬眉吐气的狂妄之师，有人反中央文革，不遗余力地予以围剿。幸亏我们这个“棱角”战斗队只活跃了十几天，未被查出，否则早就身入囹圄。

10月10日左右，一天凌晨，南翼楼楼道里的嚷嚷声把我吵醒，过一阵，我办公室门也被敲开。东方红“红色尖兵”由肖体休带队，押着红卫兵总部的王来昇，扬言来查抄黑材料。他们没想到，整栋楼我方已几乎没人。我们从未整过黑材料，自然也没有黑材料。他们走时，我指了指我作床的会议桌：“希望你们‘东方红’掌权后，和我们一样艰苦朴素。”自始至终，肖他们无过激行为。

10月17日，首都红卫兵第二司令部与我们第一司令部的“老保”集聚中南海门口，上万红卫兵手举《毛主席语录》高喊：“周总理，周总理，我们要见毛主席！”——年轻的红卫兵们实在想不通，保卫毛主席，保卫毛主席为首的党中央，保卫跟随毛主席出生入死的老干部的占首都学生中绝对多数的红五类子女，被《红旗》杂志第13期社论一下子就打入“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想不通。认为周总理是支持我们“老保”的，认为毛主席被中央文革蒙蔽，所以要见毛主席。

10月18日凌晨，周永璋、蔡新平、陈学敏、肖体休等骑着自行车，带着馒头、咸菜、棉袄，向我们表示慰问。我身为地院红卫兵的负责人之一，未受其“蛊惑”，但实际已为尔后观点打下伏笔。

在有关工作人员劝说下，时间不长，红卫兵们便秩序井然地离开中南海门口，徒步去天安门，等候毛主席接见。

10月18日，毛主席第五次接见红卫兵。我带着北地的几百个红卫兵，站在天安门城楼下的观礼台上，与“东方红”的相邻，双方还挤来挤去，互不相让。

10月18日晚，周总理在工人体育馆接见两派红卫兵。北地红卫兵我带队，“东方红”由王北宁带队。也就是这一次，是二司组织，一司中的“老保”响应，三司及北航红旗等被动跟进。从中南海走到工人体育馆，总理还未到。我安顿好地院红卫兵后，挤到体育馆门口等着。周总理微笑着，边挥手边与挤到他身边的红卫兵握手。我被推到前面，拼命向前伸手，接触了一下周总理匆匆掠过的伟人之手，顿感电击般一股暖流掠过全身。

不知为什么，三司的红卫兵强行将警卫的解放军战士换下。北京第二外国语学院的“老保”来晚了，三司的门卫不让他们进，他们硬冲，造成小小骚乱。

我到现在也不明白，周总理讲的第一句话：“彻底的唯物主义者是无所畏惧的”（而且果断地一挥手），究竟针对何人？何事？

其间，三司的红卫兵齐喊：“老保，滚出去！老保，滚出去！”而另有人喊：“受蒙蔽无罪，反戈一击有功！”我一看，是一司中的造反派“北师大井冈山”的。

提到王北宁，这位地院附中毕业的高干之女，是年级党支部培养的64届第一批学生党员。王北宁曾像一位大姐姐那样关照过我。不少男同学写信给她，对这位秀丽、体贴人的女士表示爱慕之情，她却把情书交给了辅导员赵永芳。嗨！

1966年10月18日那天，她还劝我回到毛主席革命路线。可惜红颜薄命，王北宁婚姻不如意，又因文革之事在狱中关了几年。1994年她来乌鲁木齐我家时，不到50岁的她，苍老得像60多岁的老人——这难道是当年那位充满朝气的王北宁？至今，犹记得王北宁那句“监狱不是那么好呆的……”

1966年“八二四”大辩论前后，聂树人也曾两次劝我加入“东方红”。可以说，“东方红”的头头中，文革前与我关系较好，比较熟悉的，也就是聂树人。

10月19日，张伟堂拿来火车票。当天，我们乘火车赴武汉。同行的还有一批张伟堂认识的中学生。祝天惠带一些人去山西，既回家，又去调查六十一个“叛徒”之事。

分手前，祝天惠对大势有个分析：关林，你看，矿院的造反派从保守派手中抢广播台，没人干预，可保守派组织力量反抢时，公安局出动警力抓了人，抓的全都是保守派的……由此可见，国家专政机构对两派的态度。我们大势已去。

之前，《红旗》杂志13期社论发表后，不甘失败的“老保”们曾策划成立“首都红卫兵第四司令部”，重新组织力量与“三司”抗衡，在什么地方开的会我记不得了，我和任士田未去，祝天惠和王来昇去了。祝天惠的结论是：一帮毛孩子瞎吵吵，成不了气候。其实，即使组织能力再强，策略再准确、灵活，也没用。

和其他大学生一样，毛主席著作和党报是文革中我每天必读的精神食粮，每篇“社论”都逐字逐句分析、思索。因此，那时已感到站错了队，愧对毛主席；

但又感到，毛主席要我们在大风大浪中学习游泳，喝几口水，没什么了不起的，重新振作起来：无鬼不怕鬼，无私大无畏，何惧征途难，此身早度外。

说到“大串连”，后人很难想象。一开始，毛主席“八一八”接见红卫兵后，全国各地的学生红卫兵便争先恐后拥往北京。学生哪来坐火车的钱，成群结伙的学生，车站、列车上谁敢管？去见毛主席的革命行动，谁阻挡谁就是“反革命”。到了北京，管他们住，管他们吃，安排他们分批接受毛主席检阅。所以，毛主席他老人家8次接见红卫兵，可见进入北京的学生，少说达几千万。

而北京的红卫兵，以“老大”自居，自1966年8月下旬开始，先是一司派红卫兵到上海保曹荻秋、陈丕显，后各司令部陆续向各省、市派驻人员。其中，10月后，主要是三司等造反派四处煽风点火，谓之“煽革命之风，点造反之火。”这样互串互连，交叉往来，铁路运输压力之大，可想而知。

我们从武汉去长沙的火车，座位上，座位下，厕所里，行李架上，全是人，如同罐装的沙丁鱼。吃饭、喝水、上厕所，你想都别想。一位十岁左右的红小兵，实在憋不住了，央求：“叔叔、阿姨、大哥、大姐，求求你们，我……”我见状，与几个同行的学生挤出一个空间，在车厢地上铺几张不知何方印的小报，让此红小兵蹲下拉屎。一拉一大堆，本来臭气熏天的车厢内，更是臭不可闻，骂声不断。将人强行拉开，打开窗，扔出大粪，每一步都得罪人，仗着我们多才办到。一旦临时停车，满世界是拉屎拉尿的人群，人在那种情况下，已经顾不上脸面了，管他的，解决“内急”再说。

中央巧妙地采取“疏导”——10月22日，《人民日报》发表《红卫兵不怕远征难》社论，号召红卫兵学大连海运学院学生的做法，步行串连，并加上许多赞词。这在相当程度上缓解了火车的压力，但各地的接待工作毫不轻松。好在我国街道、居委会作用巨大，成为接待红卫兵的主力军。各地做法不一，许多地方是白吃、白住，也有不少地方吃饭要登记学校、姓名。我们老实巴交的，如实报名，在1967年时补交了伙食费（我交了约5~6元）。也有不少人乱报个假名，混的。所以，后来“高元贵”院长的名下，款项最多。主要那时没有身份证，才给人混水摸鱼之机。

在武汉，住华中工学院约一个月。结识北京工业大学谭力夫的对立派吴大力、李淑琴等人，共组“首都红卫兵驻武汉联络站”，保张体学。湖北省委给我们一辆值班面包车，安上扩音器，每天在武汉市走街串巷播送我们的观点。

《人民日报》“红卫兵不怕远征难”的社论发表后，张伟堂、吴大力等人要徒步走当年红军长征走过的路。我和其他北京学生先去长沙，住长沙湖南省湘剧院。去中南矿冶学院看了看该院的“老保”漪建春同学（她8月来北京串连时认识）。后去广州，住广东省委，保赵紫阳。在省委参加过一次辩论，与我们北京

红卫兵相比，其他地方的红卫兵不是我们对手。

1966年12月30日，我与哈尔滨工业大学几个原中学时的同学，徒步从江苏吴江县盛泽镇出发。经嘉兴到杭州，学元旦社论，去杭州通用机械厂劳动。本去同工人阶级相结合，谁料让我们顶班，工人们去了上海。

继续“长征”，经富阳、常山、玉山到上饶。沿途基本上都是浙北的平地、丘陵和山区边缘，平均日行70里左右。参观了上饶集中营后，本想去井冈山，因井冈山发生流感，政府出告示不让去串连，未成行。坐火车返嘉兴，回盛泽过年。

1966年8月～1967年1月，我和我班“东方红”的只与李昌平见过面。“8·24”大辩论后，昌平在大操场碰到我，诚恳而又自豪地用浓重的河北普通话劝我：“关林，现在你还看不清形势吗？中央文革支持我们，肖力昨天还接见了我们。中央文革、肖力代表谁你知道不？”我当然知道，但心想：“周荣鑫、李人林、陶鲁笏、薄一波代表谁，你知道不？”话未出口，仅婉拒之。

刚过年，北京地院来电报：“地院修正主义红卫兵祖师爷程关林，接电后速回，接受广大革命群众批判。”幸亏是我拿到的电报，否则不吓坏爹娘？

不敢怠慢，1967年2月中旬，火车硬座返北京。祝天惠在校门口等我。一见面，他就拉我到四道口小饭馆吃了顿饺子。他说：“等了你几天，才等到你，把我急坏了。”我俩统一口径：一是不能暴露我们与周荣鑫、何长工、邹家尤等领导的关系；二是不能暴露我们炮打中央文革之事；三是所有责任我们两个担起来，不株连其他师生。尤其是一、二条，打死也不能说。祝天惠扶了扶眼镜：“我相信你。”我没说话，伸出手，与祝天惠的手紧握在一起。

回到宿舍，未几，学院的高音喇叭响起：“地院修正主义红卫兵祖师爷程关林听着：必须作出触及灵魂的深刻检查，随时接受广大革命群众批判……不准离开宿舍，有事向造反派请假……”

看管我、祝天惠的是我班的×××。我尽量婉转地对×××说：“××，我不是‘红卫兵’的祖师爷。”“那是谁？”×××追问。“是伟大领袖毛主席。”我从容回答。×××扶了扶眼镜框，瞪了瞪我。我心中暗笑。

总之，那一阶段的老保是：“受不完的蒙蔽，请不完的罪；作不完的检查，流不尽的泪。”

厄运不长。2月下旬，我班去江西串连的造反派郝云书、李捷芳、朱冬梅、王龙朝等回来了。郝云书拿了个篮球来找我：“走，打篮球去。”我说：“我检查还没写完，出去得向×××请假……”旁边的朱冬梅笑了：“去他妈的，你解放了。”于是，我解放了。“东方红”几次批斗“老保”，都是我班的造反派保了我，免受坐“飞机”等皮肉和精神之苦。

郝云书、李捷芳、王龙朝、朱冬梅一直是我关系较好的同学。李捷芳更是我的“一帮一，一对红”。他们也从未追究我们“保”时的所作所为。我在文革中的日记及收集的大量资料之所以能保存至今，得益于他们的宽容。

2月底，朱成昭请我和祝天惠开会，朱成昭的观点是：“造反派、老保中的骨干是最革命的，应重新组织起来。”我和祝未去。去开了会的曹凤珍（原老保）、梅建民（造反派）等人，后来都倒了霉。

1967年3、4月，协助革委会保卫处（水文系几个同学）清查抄家物资，住在“教工之家”近一个月。给我的结论是：清白，肯合作。我问他们，抄家的东西怎么处理？他们说，全都交到北京市，有部门统一登记、接收。

1983年8月，地质部干部考察组，尔后北京地院来函，都向我了解过红卫兵抄家涉及的一些具体问题，我写了详细的材料，认真、客观地作了回答。

1967年“五一”，我随朱冬梅、王龙朝等去劳动人民文化宫值勤。第一次参加造反派的活动，挺兴奋。我们学生在文化宫大门两侧最里层，我们身后是解放军战士。可见对学生的信赖。做梦也没想到，是毛主席站在敞篷车上，车缓缓地驶过我们身边。我们一面呼叫“毛主席万岁”，一面使劲抵住后面蜂拥的人群。毛主席皮肤黑中透红，眼神威严、慈祥。我们离毛主席也就1米左右，看得太真切了。反正，现在演毛主席的，也就古月较像。

在短暂的“逍遥”日子里，每天，下午打篮球，晚上，宿舍中人一人讲一个故事后睡觉。谁的故事评为最差，第二天早餐由他负责代购，每人一个馒头夹块臭豆腐。其他人睡懒觉。

至于后来与余久芾、张聪贤、黄凯生、马殿军组成“一月风暴”，与“二团”（周永璋、蔡新平、殷惟侯、吉让寿、肖体休、孙司权、邱世寿、赵国柱）一起反对极左思潮，又陷入受压之中，主角就不是我了。在这期间，系统地阅读了大量马列主义著作，主办了反映我们观点的油印《火星报》。

我不主张“怀疑一切”，但已对凡“最高指示”即代表真理、代表党有所质疑。所以，希望从马、列这些老祖宗的经典中寻找答案。也在此阶段跟蔡新平、余久芾等学会抽烟的陋习。

不过，原来只知“出口成章”一词，结识殷惟侯后，方知词意。每次，他讲，我记下来，就是一篇文章。真是才子。

1967年8月，随李珍、余久芾等人赴哈尔滨，支持炮轰派。

那时，相当一批学生到哈尔滨后，是去太阳岛、镜泊湖等地玩耍的。我看不惯，认为这不是革命者应有的态度。于是，便在小报上发表《我们不是来哈尔滨度假的》文章。一日，李珍陪同孟繁华专程来看我——李珍说：“孟繁华很赏识你的文章。”天哪，我实在受宠若惊。孟繁华什么人？我心目中，“东方红”出的

大字报，比我文才高的，也就是殷惟侯、孟繁华、聂树人、汪南屏等寥寥几人而已。更何况毛主席都表扬过孟繁华的文章。

孟繁华表扬了我的文章，主要是从继续革命的角度，并问我：“加入‘东方红’没有？”我摇摇头。孟郑重其事地摘下自己佩戴的“首都三司红卫兵”的徽章，给我挂上。我虽然始终没填表加入“东方红”，但孟繁华给我的徽章，却好好地保存着。

哈尔滨那时已发生武斗，幸未波及我们居住的哈尔滨师范学院。我们明白，打死他人，迟早要受惩处；武斗中被人打死——22641的李全华死在四川，还不是白死？

我因托人将黑龙江革委会常委（原省委常委？）张凤久的信经北师大女附中丁夫全转交中央，1968年底，黑龙江还两次派专人来调查，一次是省计委的，一次是哈工大的。我不认为向中央反映问题是“问题”，代转一封信更不成问题，如实陈述就是了。

1967年11月起，“复课闹革命”。半工半读教研室由赵鹏大担纲，星期天加课，晚自习到半夜……

1967年12月，随聂树人去《首都红卫兵》报社，好像是抢夺编辑、出版权，反正是造反派内部权力之争，本人不感兴趣。去是去了，出工不出力，观望一趟。窃笑。

“复课闹革命”，我班再次团聚。其间，我没闲过。我参加了院图书馆的清理，趁机博览群书。

从1967年底到1968年5月，我与潘复林老师和杨明英被勘探系派去筹建革委会主办的“教育革命展览”，达半年之久。我们负责1958～1960年间的，组长是物探系老师罗孝宽。

由于我始终是“东方红”及其革委会的对立派，在此有必要肯定对方三点：一是“东方红”掌权后，虽有几次批斗我们“老保”的场合，毕竟只是走走形式，未作组织处理式整人；二是同学们的助学金，每月都按时发放，从未克扣，包括我们半工半读有争议的工读费；三是对教育革命，进行了总结、实践、探索，“地质公社”实际上是冠以革命旗号的半工半读翻版。

当然，我也没忘记，“红色尖兵”的把孙司权打成熊猫眼；安静中、江祖如等老师被革委会关押；“二团”的弟兄们不得不跑到北大去避难；朱益麟毫不犹豫地跟我、马殿军、黄凯生、张聪贤、张钦文、陈铭、洛甫等人去北大看望避难者；汪南屏（小妖怪）、陈学敏、勘探系“大喊大叫”战斗队也是反“左”的……

1968年5月25日，我班“朱派”叫了十几个红色尖兵胡乐成之类的，以批判高元贵为名，要余久芾揭发高元贵的第二套班子及高的后台。纠缠到“啃猪蹄、

喝菜汤”的争执，气氛不太对头。去上厕所的21641班的崔元顺听闻，回宿舍一讲，引起也是“老‘东方红’”的蔡云长、高忠林、王泉等人的强烈不满，出面干预：“这年头，还搞群众斗群众？”我班唯一的一次内哄，不了了之。

5月30日，杨雨中跳楼自杀，留下三封遗书，一给王大宾，一给“长征”战斗队，一给家中。其死因，与屈死在“五七”干校荒山野岭的李明哲老师一样，至今仍是谜。

1968年7月26日，首都工农兵毛泽东思想宣传队进入清华大学，8月25日工宣队、军宣队进驻我院。其中，空军政治学院军人200人，七机部811厂工人100人，橡胶厂工人200人，共500人。8月28日，刘元广（军人）、雷乃廷、赵宝旭（811厂工人）进驻我班，召开会议。宣传队的人讲完话，会场寂静。我实在忍不住，通、通、通发了言。我的观点是：宣传队宣布每个班由5人核心组领导，为什么只剩3人，排斥2位学生代表？余久芎、郭建中“反红色政权革委会”的说法无根据！

此后是早请示、晚汇报、天天读。

8月的某一天，军宣队的一辆吉普车将我和我并不很熟识的21642班的李清连拉到空军政治学院。一位院级领导在他家里对我和李清连说：“你们是宣传队信任的同志，找你们来，是希望你们今后注意学院里老师和学生对宣传队的态度，及时将情况直接向院、系军宣队汇报。这是组织上对你们的信任，也是考验！”并郑重叮嘱：“这次谈话，必须绝对保密，不得让其他任何人知道！”还有些什么话，记不清了。反正我听了后，口干舌焦，心跳加速，脑呈空白。直到回到学院，才缓过劲来。我和李清连互相保证：“此事务必保密，但坑害老师、同学的事我们不能做。”不过，此后我和李清连接受的任务也就是每星期一二次在半夜悄悄溜出宿舍，随宣传队的人在校内或去教师宿舍查查夜。

陶世龙、黄占秋老师划归军宣队要我重点盯防的人物，我却有机会跟他们半夜还一起侃人生，谈学问。我的结论是：两位书生气十足的杂家、大师甚至宗师级人物。

1968年8月底、9月初，两次分送马殿军家老四和我在哈尔滨结识的几个师大女附中的朋友去内蒙插队。此后再未见面，42年过去了，也不知她们及另一位当老师的杨华可安好？

9月3日，1966年8月17日成立的“东方红公社”及其下属组织宣告解散。李贵、聂树人、张海涛等先后被宣传队发动群众收拾。

9月7日庆祝“全国山河一片红”（除台湾），而地院的革委会在宣传队进院后，已形同虚设。

工宣队、军宣队将我班树为两派大联合的典型，1968年11月，我和王龙朝

（后改名王刚）代表两派在全院大会上发了言。

宣传队导演的“清理阶级队伍”，践踏了人权法治，破坏了师生关系，留下的后遗症难以治愈。我们班就分别成立了“赵鹏大”、“李志峰”、“周超凡”、“陆家仕”四个专案组。我是“陆家仕”专案组成员之一。虽然我们组比较讲政策，也比较温和，我和李捷芳还就其他专案组的一些过激作法向宣传队反映过，但逼人交待的疲劳战等客观存在，那种千方百计逼人就范的手段，是在摧毁被整者和整人者双方的人性。在此，向陆家仕老师诚恳道歉！

1969年国庆前队列操练，我当了个学生中的小组长，管包括梅建民在内的一班同学。军宣队又叫我注意梅建民：“有情况随时反映。”我与梅建民一相处，十分融洽，相识恨晚。

我在工、军宣队进院后当了系宣传组的副组长。组长是李玉和，另一副组长是杨明英。真得感谢给我的这个机会。

和杨明英第一次打交道是1966年8月。红卫兵革命造反展览会我就去过一次，适逢杨明英、李学田向我提出：有人歧视出身不好的同志。我召集大家讲了讲周总理这方面的3条指示：一是有成份论，二是不唯成份论，三是重在政治表现。即，出身不由己，道路自己选。会后，物探系叫董恒功的红卫兵还拿着油印的北工大谭立夫的“血统论”，专门到我办公室找我辩论。我懒得理他。

后与罗孝宽、潘福林、杨明英一起搞教育革命资料整理，也就是互相见面打打招呼。

真正熟悉是在同一个宣传组。一起采访、调研，写稿、改稿，出板报……从友谊到爱情，很自然地一步步走了过来。我对人生一直持积极奋进的态度，失误之处甚多。但与杨明英共结连理，却是我一生最为自豪、自得的成功。与此相比，地位名利，何足挂齿。

与杨明英的一次误会：1969年10月，我们在首钢850工地“接受工人阶级再教育”。冉宗培、李紫金、余素玉等召开党支部会议。由于涉及宣传，让我这个“组长”列席。在会上，我不太同意冉书记的意见，谈了自己对宣传工作的具体建议，李紫金、余素玉老师肯定了我的建议，冉老师也同意。但就是这么平平淡淡的一次会议，我的一个发言，传到杨明英那里，就成了我“凌驾于党支部之上”了。我怎么解释，明英半信半疑。还是余素玉老师帮我澄清了事实。

我与工宣队处得不错，与空军政治学院派的军宣队时有争执。记得1969年国庆前，军宣队授意我代表北京地院的红卫兵写一篇提倡大联合、大团结的文章。我认真地写了又改，改了又写，军宣队还是不满意。我明白，他们要我删去文中“在大联合中，不能用派性去消除派性”以及工、军宣队要“一碗水真正端平”的观点。我就是不删。军代表杨上校居然说：“怪不得有人说，文章是自己的好，

老婆是人家的。”可见其失态和无奈。最后还是杨明英改的。文章在《人民日报》发表了，与我原稿面目全非。

1969年12月，去湖南前，与几位老师告别。

安静中和濮长萱大姐留我吃饭。饭后，安静问我：“快毕业了，个人问题考虑了没有？”听我说“已解决”，安静问：“哪个系？”听说是勘探系的，64年在四川负责招生的安静沉思片刻后说：“勘探系，除了杨明英，其他女孩子你看不上。”“杨明英品学兼优，高考成绩上清华都没问题。”濮大姐把她在第一届全运会上代表中南区所得的女篮银牌送给了我。

余素玉老师正同他爱人整理书刊，她知道我爱书，指着一堆书说：“你看有没有你需要的，反正我准备卖掉。”冥冥中如有天意，我挑了本油印的《石油地质学》。那时，我哪能知道，自己一辈子搞石油物探、石油经济。那次，21641的杨流孝也正好来看望余老师，我们还一起喝了两杯葡萄酒。

.....

一晃四十多年过去了。现在，封建社会那些陈芝麻烂谷的事都有人一遍遍翻出来，电视、电影，比比皆是。为何独要回避文革中目前尚能说清楚一部分的事呢？史实又怎能回避！

近几年，在新疆频繁地见到抱“老有所为”心态而来的蔡新平、朱德瑜、张北峰、王润民等学友。“别来沧海事，语罢暮天钟”之余，深感，乘尚未老年痴呆，还是应写点东西留下来。每个个体，眼见的可能也未必为实，但无数点水珠终可汇成汪洋大海，而且内蕴着无数个鲜为人知的真实细节。

必须指出，文革中，无论造反派、老保还是逍遥派，都有个底线：忠于毛主席！你说是个人崇拜也好，个人迷信也罢，这就是当年的红卫兵、学生们衡量是非的标准。

必须指出，文革确实深刻地触及每个人的灵魂。并不在于你是哪一派的，而在于每个人的品德和良知；对中央指令，你的态度是积极还是消极；是否实事求是地做人、办事。

另一大遗憾是：1966年10月前，毛主席接见红卫兵时，上天安门城楼的珍贵名单是由李维宇打电话与我商定的，我推荐了我班的陈生宝，自己却失去了机会。李维宇、陈生宝都有幸与毛主席一起照了相，至今李维宇还珍藏着，并数落我“太傻！”

历史决定，我们这一代是承前启后，奉献为主，学雷锋那样，甘做“傻子”的一代。期望后有来者。

2011年6月18日于乌鲁木齐

田春林回忆录（节选）

田春林

邹家尤的临别赠言

大约是在 1966 年的 7 月底，毛泽东已从南方回京，中央已经明确了在前一段的运动中向大专院校派工作队犯了方向路线错误。北大地质系也有同学冲破阻力来地院煽风点火。说中央首长在北京宣布责令工作队撤出学校。驻地院的地质部工作队也毫不例外的着手做撤出地质学院的准备工作。作为前段在“反干扰”中受到打击迫害的重点人物之一，我思想上的压力也有所减轻。有一种天亮了的感觉，

一天，驻班级工作队队长突然通知我到学十二楼的工作队驻地去开一个座谈会。我如约在规定的时间内来到学十二楼二楼的一个小会议室，进门后看到已到了不少人，有些人我认识，像李仲学等人在 6·20 时就认识，有些我不认识，人已基本坐满后大概有二三十人的规模。会前并没有说是什会，只说是座谈会，但见到与会者以后，发觉这些人都是在前段 6·20 事件中表现积极，在“反干扰”中受到打击的“游鱼”、“反革命”们，这些人大概都有与我相同的遭遇。我心想，是不是要宣布对我们的处理决定啦？因为在“反干扰”期间从工作队就传出运动很快就结束，已经风言风语听到要把我们这些人送到河北沙城劳改农场去改造。

正在思绪不定的时候，主持人宣布开会，并请出工作队队长邹家尤讲话。这么近距离接触邹副部长，对我来说还是第一次。邹家尤讲话的内容大致是以下几个部分：

第一，由于这次文化大革命来的突然，没有思想准备面临瞬息万变的形势，很不适应，很不得力，工作队从组队到进院不到十天的时间仓促上马，对地院的形势也没作深入了解，就匆忙上阵了，因此在前段的地院文化大革命中工作队显得很不得力，很不适应，领导运动很不得法，犯了错误，这些错误主要由我这个工作队队长负责任，不怪下面的工作队员们。

第二层意思是说，在前一段的反干扰运动中由于工作队的错误领导，使一些运动中的积极份子受到了不同程度的伤害、打击和不公平的待遇。尤其是在座的同学们受到的打击，伤害更大，我代表工作队党委向你们并通过你们向一切受到伤害的同学赔礼道歉，前阶段大家的检讨书，认罪书以及批判你们的文章，整理你们的材料等一律退还本人当面销毁。不入档案，不影响入党、入团和工作分配，

第三层意思，邹家尤语重心长现身说法，说到自己从小参加革命，经历过长征，抗日战争、解放战争的考验，家庭出身很苦，是一个红小鬼出身。就这样在延安整风时也受到了怀疑和审查，受到委曲，被关过禁闭，并下到基层当战士等不公正待遇。但是经过组织上的审查外调证明我是清白的，最后又恢复了名誉和职务。重新受到组织和同志们的信任，总之要相信组织相信党。一个革命者不但要受到革命斗争残酷环境生死的考验，有时还会受到内部的误会、误伤，不被信任等等的考验。这样才能成长为一个成熟的革命接班人。

最后他要求我们回去以后不要有怨气、不背包袱，不要对前阶段反对过自己，批评过自己的同学闹对立，要有宽广的胸怀，原谅那些同志。要团结那些反对过自己并证明反对错了的同志一起干革命。

总的来说，这个会是邹家尤在撤出前的小型检讨会，是安抚会，是一个临别的赠言。会后两三天，工作队就悄悄撤出了地院，看来走得很匆忙、很低调、很不光彩。记得邹家尤讲完话还要大家自由发了言，说有什么气就出出吧，当时朱成昭发了言，他称邹家尤为邹叔叔，这大概是那个年代干部出身的晚辈对与他们父辈有同样革命经历的长辈的流行称谓吧。朱成昭发言的内容是说自己父亲是新四军老战士，自己对党、对毛主席有深厚的感情，在前一段的运动中自己满腔热情投入运动，只是对工作队提出了一些善意的批评，在班上就被批判斗争，思想上很是想不通，通过邹叔叔的这次讲话，思想上也转过来了，保证不背包袱，不计前嫌，积极投入运动。朱成昭是又倒苦水，又表了态度，会议就这样在比较温和的气氛中结束了。

对这次工作队临别前的安抚会，我有一个深刻印象，那就是本来“反干扰”的起因是由薄一波批示引起，是由邹家尤在全院师生大会上亲口传达的薄一波批示，并把它作一个尚方宝剑来镇压地院群众运动的，但在这个会上邹家尤都只字未提薄一波批示，而是大包大揽把一切错误责任统统归于工作队，归于自己名下。

据后来听到传闻，在这次安抚会后，薄副总理在计委小会议室曾经小范围接见了地院“反干扰”中受到打击迫害的同学，接见的人员范围比这次更小些，是在一天的夜里，由何长工、邹家尤将在“反干扰”中受到打击的全院重点人物名单交给了薄一波，薄一波还一个个点名并和大家握手，在这个名单上当然也有我的名字，不知什么原因我却没接到通知，没有参加，只是后来听到朱成昭的口头传达。据说会上薄一波发了脾气，狠狠批评何长工、邹家尤，大意是说我是分管工交口副总理，是抓工交生产的，并不管运动的，看到你们一个关于地院文革情况汇报后就在上面随便写了几句话，并没让你们（指工作队）去传达，更没让你们乱解释，什么反工作队就是反党、反革命等等。更不知道这几句话对地院文化革命造成这么严重的后果。

很显然，这是毛主席回到北京以后对文革当中派工作队并镇压学生的作法已表示出不满，风向变了，工作队错了，薄一波为了推卸责任来了这么一招，使何长工和邹家尤们替他受过，有口难辩。

有一个细节不能不强调的是，就在这次薄一波的接见会前，由邹家尤交上去的地质学院“反干扰”期间受打击迫害的重点人员名单，二十年后，给我带来了大麻烦。我毕业后分到湖北黄石工作。1985年，薄一波已经平反并荣升中顾委副主任、中央整党领导小组副组长，到湖北检查整党和清查“三种人”的运动情况。薄在省委洪山礼堂听取各地方组织清查部门汇报，当听到黄石市委的汇报时，从兜里拿出一个小本本，翻看后告诉黄石市清查办的领导，地质学院有个造反派头头田春林，听说在你们黄石市，这个人你们如何处理？他要不定“三种人”，那就没有“三种人”了。如此身居高位的老革命，几十年后还念念不忘我这个当年并不曾得罪过他老人家且从未谋面的学生，今天在山沟里搞地质的一个小小地质匠，不失时机地如此“关照”。可见这位无产阶级革命家的“宽广胸怀”。这个细节是我在黄石地质队工作时与我关系不错的副队长（也是我河南老乡）事后告诉我的。他是我专案组成员，在黄石清查办听传达时，清查办的人说的。并说薄老的记忆力真好，都二十年了还没忘记你这个红卫兵小将。这话不知是对老人家的褒还是贬。

这年我从湖北调河南驻马店，本来湖北原单位想让我调走了事，不转材料了，有点想保我的意思（这时队上领导班子已进行了大调整，与抓516时不同了）。哪知我回河南才两个月，湖北原队上一位副书记，是不久前刚从技术人员提起的，人很正派，跑到河南我家，向我透露，叫我思想作好准备，可能又要折腾一番了，我们本想让你一走了之，不转材料，哪想黄石市委不依不饶，三天两头打电话催问。他们是受省、中央整党办、清查三种人办公室催办，不得已才把材料转河南来的，我估计我们这些重点人是难逃劫数的，尤其是那位薄大人对我特别关照，由此我对原单位心存感激，毫无怨言。

果然，不几天，驻马店市委组织部找上门来和我谈话，好在一切不影响，照常生活，上班。这几位后来熟了，说，要知道你有这些破事，我市不该接收你，当时是把你作技术人才引进的呢。他们也说中央整党办、清查三种人办也过几天就打电话问情况。由此，驻马店组织部又组织一个三人小组，外调我半年多，最后结论是犯有严重政治错误，行政记大过一次。这个结论不伦不类，令人啼笑皆非。我的签字是：保留意见。

肖力来地院

肖力来地院是地院文革史上的一件大事，这件事发生在 1966 年的 7 月底、8 月初，工作队刚撤离地院。时间正是在东方红战斗队成立的前后几天。当时我和伏庆是从学 11 楼五层宿舍搬到教四楼东方红战斗队办公室，在二楼，当时东方红战斗队设有办公室、来访接待室、宣传部、印刷室等机构。在来访接待室负责接待的同学我记得比较清的有我们班的贾维千等人。

有一天，接待室同学带一位女同学来见我，说是北大的同学，要见东方红战斗队核心组成员，那时候外校到地院东方红来串联了解文革情况的同学很多，比如建工学院的张玉晋、贾建，政法学院的陈荣金，石油学院的姜阳，农机学院的潘朝金（文革中改名潘朝东），北工大的高升等。这些外校的同学就是那时通过来我校串联我才认识的，后来他们都成为各自学校少数派的头头，但是北大的从没见过。这位自称北大的并要见核心组的女同学自然使我很关注。

来人二十五岁左右，身高 1.65 米以上，身材丰满，戴眼镜，齐耳短发，上穿短袖白衫，下身蓝布裤，手提一个黑色塑料文件袋，脚上是塑料凉鞋。她自称是北大历史系五年级学生，我们握了一下手就坐在椅子上交谈起来，这时她从文件袋中拿出一张 32 开、用粗黑铅笔书写的便笺，字是从右向左竖着写的，内容是：

兹派肖力同志为中央文革小组驻地质学院文化大革命观察员。

陈伯达

看了陈伯达亲笔签名的便笺，我心中十分激动，欣喜若狂。她笑着对我说，想和核心组的所有成员见个面。我立马照办，就把在其他屋忙的核心组人员都叫来并向他们作了介绍，大家都非常高兴。那天核心组到场的有伏庆是、朱成昭、刘长风，其他的我不记得了。聊的内容是问了我们核心组成员的姓名、年龄、家庭出身，读几年级等基本情况，并作了详细记录，又问了工作队的情况，如队长姓名、什么时候进校，什么时候离校，“反干扰”抓了多少“游鱼”，东方红战斗队有多少人参加等等。我们还专门介绍了刘长风，说他是著名作家、长篇小说《创业史》的作者柳青的儿子。大约谈了一个多小时，她就告辞走了。

核心组成员都知道她是中央文革派下来的，后来的东方红战斗队的核心组和早期成员都知道肖力的名字。地院的许多重大活动都留下了她的身影和影响。“二进地质部”期间她与地院东方红主要领导成员的来往尤为频繁。

肖力真实身份的确定，是在一次毛泽东接见红卫兵的时候，朱成昭受邀作为地质学院东方红的代表上了天安门。具体时间我已经记不清了，据蔡新平说是在“二进地质部”期间，那么就可能是“九一五”那一次。那天，当毛主席从天安

门城楼休息大厅走出来时，朱成昭发现搀扶老人家的是一位青年女军人，当朱成昭仔细端详时惊呆了，天哪，那不是肖力吗？她怎么搀扶着毛主席，她和主席是什么关系？这时传来了革军子弟也是东方红老战友的张玉晋的声音，他告诉朱头：肖力是毛主席的小女儿李讷。这使朱头激动万分。他回来后在第一时间把这个消息告知了核心组的几个人，大家别提多高兴了，我们的腰杆更硬了，我们是通天的，我们的后台是毛泽东！看你“斗批改”还能蹦跶几天！（下图：肖力与毛泽东在天安门城楼上。）

这消息不久大家都知道了，连保守组织也知道了，这对他们的信心是极大打击。肖力的特殊身份相当于毛泽东的文革观察员，只此一点就足以具有地震效应。

8月22号，东方红公社几百人“一进地质部”，要求地质部交出工作队长邹家尤到地院检查交代，接受批判，地质部领导拒不接受。静坐抗议的同学被西城区红卫兵围困。正是通过肖力，中央文革促成了北京新市委领导陶鲁笏出面主持，地质部主要领导和邹家尤到场，东方红和对立面保守派的斗批改红卫兵两派面对面开展了一场大辩论。大辩论



从23号夜里9点多开始，直到24号凌晨结束。据说辩论一开始肖力就来了。她在会场后边时而走动，时而伫足，观察辩论会进展情况。虽然到会旁听的有很多外校的人，但没人认识她，只有我们东方红核心组的人知道。当时朱成昭代表东方红在主席台坐镇，蔡新平作为东方红的首席代表，主辩手，组织并参加辩论。陪同肖力在会场后面的有我、伏庆是、刘长风等同学，我也因为主要任务是维持我方秩序，处理临时事务而只跟她聊了几句。刘长风、伏庆是陪她的时间更长些。她是何时离去的我也不知道。

这场辩论结果东方红大获全胜。“8·24”是东方红由弱变强的转折点，大辩论后几天的功夫，东方红队伍就由几百人猛增到一两千，保守派从此一蹶不振。开创了文革期间尖锐对立的两派用文斗，说理辩论，以理服人从而战胜对手的先例。可惜，文革后来的发展，已很少有这种漂亮的说理斗争了，武斗和蛮不讲理全面取代了文斗和以理服人。

1966年的10月份，我在三司核心组工作，有一天肖力打电话给我，让我约

朱成昭、蒋良朴在劳动人民文化宫门口见面。我就给住在地质部的朱、蒋打了电话，三司总部就在劳动人民文化宫办公，我们三人一起在文化宫门口迎接了肖力。已经是秋天了，她穿了一件双排扣女式秋装，围一条蓝色三角巾，手提塑料文件袋。我们四人边走边聊，走向文化宫后院，找了一个休息凉亭坐下，这次见面我感觉就是聊天，气氛宽松而愉快，她又一一问了我们的年龄、年级。我们三人老蒋最大，1941年出生，朱成昭1942年出生，我1943年出生，她说她1940年出生，因此我们应叫她大姐。她又顺便了解了一下三司的情况，诸如有多少学校参加三司，下设哪些机构等，又问了学校出外串联的情况。

告别时，我们三人把她送到文化宫大门口，朱成昭代表我们三人托她向主席、江青同志问好，她也知道我们已知道她的身份，彼此心照不宣，微笑着点点头，向西沿长安街而去。文化宫离中南海新华门很近，中间只隔一个天安门，想必她是直接回家了。

我最后一次和肖力见面是在地质部联络站期间，时间应该是1966年的12月底。那时同学们大都外出串联了，地质部机关被地院东方红折腾得处于“停摆”状态，留在北京的几个核心组成员都住在地质部当时称之为“地院东方红驻地质部联络站”，朱成昭、蒋良朴和我等人就驻在那里，联络站建有自己的广播台，由黄瑞华负责广播台的事，每天通过广播台向大院广播有关文革的宣传内容。当时的地质部联络站事实上是地院东方红的临时指挥部，朱成昭通过电话与出外串联的东方红驻外地联络站联系指挥，他曾扬言说在地质部装几十部电话可以指挥全国运动。而外地返京的同学也都到地质部联络站汇报请示工作，有几件轰动全国的大事就是在地质部联络站策划完成的。

1966年12月，我因骑摩托摔成脑挫伤，先是住在宣武医院治疗，出院后住在地质部联络站休养，水文系一年级汤鸣皋同学负责照顾我的生活，每天给我打饭、提开水什么的。到12月下旬我已基本痊愈，能够自由行动了。

有一天肖力突然来访，但是朱、蒋等核心组人员都不在，而肖力只认识我，按照常规，肖力来之前都会先来电话预约，但这次却落空了——后来我分析，朱成昭可能是有意回避，不愿见肖力。因为那时候叶向真已经和朱成昭打得火热，随着叶、朱关系的升温，朱已经开始淡化了和肖力的关系，平时在言谈中已经流露出对江青、肖力的不尊重。

肖力的到来使我感到很突然，汤鸣皋同学和我向她介绍了我伤情恢复的情况，她又问了一下学校和朱成昭的情况，我们三人就下楼边走边聊，三人从地质部北大门一直走到白塔寺，中途在一个小饭馆随意吃了点快餐后，她在白塔寺搭公交车回家了。

在我的记忆里，肖力就是毛泽东派出的担负特殊使命的自由战士，她的任务

就是煽风点火，她的足迹不只是地质学院，政法学院的造反组织政法公社陈荣金也跟她很熟，建工学院“八一”兵团的张玉晋也跟她很熟。后来听说陈荣金在抓5·16时被逼疯，自称是肖力的男朋友，并且跑到中南海要见肖力（当然没见到）以证明自己的清白。最近听说陈荣金已去世多年，不知是正常死亡还是死于非命。

以我一个文革中的红卫兵的亲身经历，我体会到，红卫兵运动可以说“成也毛泽东，败也毛泽东”。运动的初期，毛泽东为了打倒自己的政治对手刘少奇，支持红卫兵运动，甚至不惜派出自己的老婆和女儿煽风点火。而当刘少奇被打倒以后，政治目的已经达到，红卫兵造反派已没有利用价值了，于是又发动所谓抓5·16运动，制造莫须有的罪名，把这些人统统打下去。联想1949年建国前他为了打倒政治对手蒋介石，曾那么卖力地和民主党派套近乎，许诺共产党胜利后要和各民主党派组成联合政府，在那个著名的和黄炎培的“窑洞对”中，向民主党派和人民描绘了多么美好的政治远景！当自己大权到手，为扫清障碍，实现独裁统治，1957年发动所谓“反右派”斗争，把所有民主党派一巴掌打下去。这几乎和文革中红卫兵运动的历史结局有异曲同工之妙。

我记忆中的抓彭德怀事件

在地院的文革史上，我认为有几件大事有必要重点叙述，来龙去脉要搞得清清楚楚。一个是抓彭德怀事件，一个是揪斗彭陆罗杨事件，第三个是朱成昭反中央文革事件。

对于抓彭德怀事件，有的同学写了不少文章，这件事的亲历者除去王大来、钱欣两位已经去世以外，还大有人在，完全可以搞得清楚。我作为这件事的北京总部的亲历者，只能就北京总部的指挥策划过程作个交代。而在写这段文字之前的2011年3月13日，在武昌的地质大学内和蒋良朴、伏庆是聚会时，我把我的记忆和蒋交换了看法，他当时也和我一样住在地质部联络站，他对我的回忆内容表示肯定。

抓彭德怀事件发生在1966年12月份，当时大部份同学都已到外地串联，去煽革命之风，点造反之火，各地以三司的名义或地质东方红的名义建了不少联络站。而总部朱成昭、蒋良朴等人从“四进地质部”后就留了下来，成立了地质部联络站，实际上这里成了地质东方红的总指挥部。我当时因为骑摩托摔成脑挫伤，出院后住在地质部休养，因此也参与了一些总部的活动。

在我的记忆中并不像有人写文章说的抓彭德怀是周总理、江青等中央文革派地质东方红去成都。我记得的情况是，大串联开始后，我们学校有不少同学涌向四川成都串联，其原因我分析有以下几点：第一成都也有一个地质学院，他们学

校的三系也就是放射性地质和放射性物探系是从我们学校刚刚整体合并到成都地院的。因有此历史渊源，同学、熟人较多，便于联系；第二个原因是成都是西南第一大城市，四川成都的运动对云、贵、川（包括重庆）有较大影响，因此三司的西南联络站自然建在成都。在这个联络站的师生，我有印象的有王大来，有钱欣、郑文清（外号小炉匠）、谭宝华、朱德玉等人，后来王大宾也从武汉到了成都。这些同学在成都活跃在各高等院校、党政机关，到处去看大字报。有一天郑文清等人给总部来了一个长途电话，内容是：他们在成都看大字报时发现了彭德怀的行踪，当时彭德怀被贬到大西南三线建设指挥部任副总指挥是公开的事情，说彭德怀到学校等处看大字报，并不回避红卫兵，有时还和红卫兵交谈。朱成昭接到这个电话后指示他们要注意彭的动态，搞清他的住址和周围环境，当时并没有让他们把彭抓回北京，而是在第一时间把情况汇报给了中央文革江青和周总理。并请示是否可以把彭搞回北京来。很快从中央文革江青、戚本禹等处反馈回了消息，说是可以把彭搞回北京来批斗。这个中央文革的批示很快又通过长途电话由朱成昭传达到成都的同学那里。并且为了保密，把这次行动定为“抓聂克”行动。但是当郑文清、王大来搞清了彭的住址，和彭有了几次接触以后，他们竟被彭老总给说服了，动摇了，认为老头子在庐山会议上是冤枉的，他所反映的大跃进以来造成的饥荒、饿死人等都是事实。他们不想再把彭抓回北京了，他们天真地认为四川天高皇帝远，有利于彭德怀躲过这场风暴和打击。

对于前方的动摇犹豫，朱成昭又一次反馈到中央文革，这时江青派了自己的秘书阎长贵到地质部，这也是我唯一的一次见到阎长贵，个子不高，穿军服，山东人，豫东口音，他的到来是传达中央文革江青的指示的，是来督战的，再次明确，《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是有所指的。彭德怀就是现代海瑞，要求地质东方红的红卫兵在抓彭问题上不能犹豫，这是个大是大非问题，是个政治态度，不要犯政治错误。针对这种情况，经过总部研究，决定采取两项措施，一是由总部派人坐飞机迅速赶到成都督战，坚决贯彻总部和中央文革的意图，迅速将“聂克”押回北京，第二是电话命令正在武汉串联的王大宾带领串联同学转道成都加强力量，贯彻总部指示不动摇。王大宾接到朱成昭电话，很快赶到了成都。在派往成都代表指挥的人选上开始曾考虑让我去，我也表示愿意去，后来认为我的身体还没完全恢复，就又另外选派刚从外地串联回来的胡乐成去。后来又发生了北航红旗在成都串联的人探听到中央文革的指令介入此事并与我们发生争执的一波三折。但最终还是由王大宾他们将彭押回到北京。

从这一过程可以看出，朱成昭 12 月份在地质部期间，思想上还是紧跟中央文革的，对待中央文革的指示基本上还是服从和执行的。

黄克诚说“红卫兵对我很好”

事情发生在 1967 年 2 月份，彭德怀已经被地院押回北京并交卫戍区监护。有一天我在学九楼的卧室兼办公室接到一个从山西太原打来的电话，来电话的人我并不认识，他作了自我介绍，原来他是地院东方红驻山西联络站的同学，他说彭黄反党集团的重要成员黄克诚在山西。黄克诚 1959 年庐山会议后被贬到山西省任省委书记处书记，文革中很自然被山西省委造反派揪了出来，来电话的同学问我可不可以把黄克诚像彭德怀一样也搞回北京？我稍加思索后回答可以，我当时并没有想保护黄老的意思，我还没有那么高的超前意识和境界，只是觉得“彭黄集团”嘛，彭都搞回北京了，那么黄也应当搞回北京，和彭一起交中央处理。当时我给来电话的同学几点意见：第一要和山西省委造反派协调好，万不可发生冲突，作到和平交接。他说不会，他们和造反派关系很好，当地造反派一切都听他们的。另一条是要低调处理，就乘一般列车，不坐专列，不搞宣传造声势，知道的人越少越好。回校后也不要宣传。他们说可以，就照我说的办。我将此事告诉了办公室主任伏庆是，并叫他作好生活上的住宿安排。

大约两三天后黄老来到了地院，那几个陪同的同学把他和警卫秘书交到总部就完成任务走了。黄老和他的秘书被安排住在和我只隔一个门的九楼四层一个房间。

有一天我走出住室，在走廊上碰到一个瘦削老头，中等个子，穿一件旧军大衣，高度近视，戴一顶咖啡色栽绒军帽，向我打听男厕所在哪里。伏庆是告诉我他就是黄克诚。等黄老出了厕所回到卧室，我和伏庆是一同来到他们屋子。询问秘书还有什么需要帮忙，回答说没有什么。我们寒暄几句就出来了。

在黄老到地院的同时，我们就电话通知了卫戍区李钟奇办公室，没几天就来了一辆军绿色大轿车将黄老接到卫戍区去了。

黄克诚到地院这件事，我是自己作主处理的，没有请示任何人，就只有我和伏庆是知道。这件事也是我多次受审的罪状之一。第一次提出是 1971 年抓 5·16 的时候，让我交待黄老到地院的过程，我就如实将以上过程写了一遍。可能是 1971 年时黄老尚未平反，此事就挂起来了。到 1978 年在“说清楚”运动中（说清楚与“四人帮”有联系的人和事）又作为一条罪状提出来，这时黄老已获平反并恢复工作，当时我所在的地质队党委书记刘恩贵（曾作为中南冶金勘探公司宣传队派驻武汉地院担任过党委副书记）亲自跑到北京黄办去外调。黄老立即命秘书写了一个证明材料：我于 1967 年 2 月×日被红卫兵从太原带回北京地质学院，在地质学院共×天。红卫兵对我很好，没有给我制造任何麻烦。几天后就被卫戍区带走，证明人：黄克诚。

运动结束后和刘书记聊天时，他向我说了这次外调的经过。听完后令我感动。联想到文革运动初期，邹家尤在向薄一波汇报地院“反干扰”运动中被打击的学生名单时，上面有我的名字。这个名单被他保存到1985年到湖北检查清查“三种人”工作时拿出来“秋后算账”，说要把我定为“三种人”，使我又受到没完没了的审查。同为中共高层的老革命家，做人的差距咋就那么大呢？

我和朱成昭的相识

我和朱成昭相识于1966年的6月20号以后，也就是地院文革史著名的反工作队事件，“6·20”事件之后，“反干扰”运动之前。他是水文系四年级学生，我是地质系三年学生，要不是文化大革命，谁也不会认识谁。在“6·20”事件之前地院文化大革命的所谓“四大”即大鸣、大放、大辩论，大字报的形式，还只局限于各系、各年级、各班进行，大字报多是以一个人的名义或者同班几个人的名义贴出。一般大字报贴出后在下面写上班级署上姓名，说白了，就是单打独斗阶段。6月19日院教辅处处长李贵在学九楼对面大字报栏贴出了第一张向工作队开炮的大字报。当我看到大字报后非常兴奋，在第一时间以个人名义发表支持李贵观点的大字报，并将大字报贴在李贵大字报的旁边，最显眼的位置。可以说是一石激起千层浪，立马打破了工作队进院后文革运动死气沉沉的局面，连我自己都想不到竟有那么多的同学和我持同一观点，在我发表声明的大字报下方空白处不到二个小时就有几十个同学跟贴签名表示支持，把大字报空白处完全占满。当人们散去后，我带着一个小本子将在在大字报上签名的同学的班级、姓名抄了下来，然后按图索骥去和那些同学联络交流。通过这种方式我认识了几十个同学，现在记得的有张华福、滑振东、李仲学、王北宁、程西平、刘长风……等等，这些同学就是后来成立东方红战斗队的第一批成员，也就是所谓的老东方红。

“6·20”事件以后大字报铺天盖地，掀起了一个矛头指向工作队的高潮，提出了“搬开绊脚石自己闹革命”，“工作队是小脚女人”，“踢开工作队自己解放自己”等等口号，这时候就出现了以班级相同观点的同学组织战斗队刷大字报的新形式，比较著名的有水文四年级朱成昭的“爆破战斗队”，探工一年级张华福的“打狗队”，还有什么“红岩”、“丛中笑”、“海燕”、“赤卫兵战斗队”等。

我和朱成昭也就是在这时候相识的。那天我和同班同学伏庆是相约一起去北五楼的四层水文四年级男生宿舍，找到了朱成昭。朱成昭，上海人，伏庆是也是上海人，两位上海老乡很快就聊得很开心，很投机。

在薄一波批示传达之后（大约6月26号之后），“反干扰”的大棒砸向了我們头上，从此在一个多月的“白色恐怖”时期，我和朱成昭就再也没有任何联系。

都各自缩回到班上接受工作队的批判，没完没了地写检查交代问题。

我和朱成昭的再次聚头就是工作队撤出前由邹家尤召开的那个带有赔礼道歉安抚性质的小型座谈会，从那天开始，我和朱成昭几乎天天在一起讨论文革的有关话题，并到北大看大字报，向聂元梓求援。为了有一个议事的场所，我和伏庆是把行李搬到了教四楼二层的一个小教室，应是7月底8月初，把课桌一合就成了床铺，白天议事，夜晚就在那里睡觉，从此教四楼成了我院少数派的办公楼，在这里诞生了第一个跨系、跨年级和班级的造反派组织东方红战斗队，并在一楼大门口写上了“东方红战斗队办公室”的红底黑字的招牌，二楼设有办公室、接待室、印刷室、宣传室等等。那时候年青气盛，革命热情高涨，人像打了鸡血一样，几天几夜不睡是常有的事，还天真地认为，自己没有赶上“五四”运动和“一二·九”运动，而现实中的文化大革命就是当年的“五四”“一二·九”，是非常幸运的，身上有使不完的劲。

教四楼可以说是东方红的摇篮。在这里我们接待了中央文革派来支持我们的肖力同志，在这里我们接待了无数来自外校甚至外地还在受压未获解放的难兄难弟们，把革命造反的火种撒向四方，在这里我们策划了“8·8”庆祝16条发布的大游行，策划了进军地质部和“8·24”大辩论，通过这一系列的行动，我和共患难的朱成昭建立了兄弟般的战斗友情。

我和朱成昭的分手与重逢

凡经历过地院文化大革命的那几届同学校友，都知道我和朱成昭是共患难又一起扯旗造反创立东方红的哥们、战友。但为什么从1967年的2、3月份，在朱成昭的周围却不见了田春林的影子呢？为什么在以后被打成反革命的“叶朱反革命集团”案中没有田春林的名字，他如何漏网的呢？

对于这些，外界有各种说法，有的说田春林背叛了朱成昭，有的说朱成昭抛弃了田春林，甚至有人说田春林是花花公子，到文艺界追美女去了。对于以上种种说法我都一笑了之，不加任何辩解。对于其中的缘由，大概我只和伏庆是等几个铁哥们透露过大概。但从未详细披露过。

要说朱成昭对我的信任，那真是铁哥们，从以下几件事情可见一般。

先说三司的成立。三司是首都大专院校红卫兵中成立最晚的红卫兵组织，最初是由我们东方红牵头，串联政法公社、建工“八一”、清华井冈山等造反派组织筹备成立的，最初我院是由周永璋同学以东方红（老东方红）的名义出面上下联络筹备，并于9月初召开成立大会，挂牌在天安门东侧的劳动人民文化宫为办公地点。三司是受到中央文革、周总理、江青等人大力支持的，它在首都，乃至

全国都有很高的威望和影响。朱成昭对周永璋一直存有戒心，为怕三司大权落入周永璋等人手里，而自己又没有精力顾及三司要务，对周又不放心，于是委派我代表他和地质部东方红为常驻三司代表，参加核心组工作，将周永璋排挤出领导核心。此举足见他对我的信任程度。

又一件事是我在三司工作期间，1966年12月下旬，骑摩托车出车祸造成脑挫伤，被送到宣武医院救治，朱成昭 and 老蒋在第一时间赶赴医院，当我从昏迷中醒来时，第一眼看到的是朱成昭泪流满面弯下腰在大声呼唤我的名字，此情此景永远定格在我的脑海里。在宣武医院住院期间，他又指派汤鸣皋、王北宁等同学照料我的生活，那时因为年轻，身体素质好，在宣武医院住半个月就出院了，出院当天，朱成昭 and 老蒋又要了地质部部长专车吉姆车，把我接到地质部休息，并安排汤鸣皋照料我的生活。朱成昭对我所作的这一切可以说不是亲兄弟胜似亲兄弟。

但是我们还是分道扬镳了。导致我们兄弟分手的原因，是对一个特殊人物的看法上产生了严重分歧。这个特殊人物就是中央戏剧学院毛泽东思想红卫兵造反团头头叶向真。

事情是从我在三司工作期间的一件事情引起的。1967年初，我出院后在地质部休息一段，就又回三司上班去了。不久，朱成昭也搬回学校，住在西三楼三层东北角的一间教师宿舍，此后几个月，朱的宿舍也成了东方红上层的一个议事房，可以称上书房吧。

有一天晚上，我到北京人艺我的朋友蔡安安（北京人艺造反派的头头，曾在电影《烈火中永生》和《李四光》中扮演华为和李四光的一个学生）那里去玩，碰到了中央戏剧学院导演系女生王敏（此人后来任解放军艺术学院戏剧系主任），蔡安安给我们作了互相介绍，当王敏听说我是地质部东方红头头之一又在三司核心组工作时，极为兴奋地向我介绍她们学校的运动情况。她和叶向真在中戏导演系是同班同学，她参加的组织名称为中戏“红旗战斗队”。头头名叫魏阳，也是导演系同班。她说，叶向真的毛泽东思想红卫兵不是造反派组织而是假造反真保皇，是工作队的打手，而红旗战斗队才是真的造反派，少数派、挨整派，叶向真是个投机派、保皇派，文革初期，中戏工作队是由解放军军事科学院派来的，叶的父亲叶剑英是军事科学院院长。工作队进院后成立了校文革小组并扶持叶向真当文革小组长，在那期间工作队和叶向真同样抓了“游鱼”，整了反工作队师生的黑材料，当7月下旬毛主席回到北京并开始批判资反路线的时候，叶向真见风向变了，也可能听到了内幕消息，就摇身一变扯起了造反的旗帜，在中戏率先成立了毛泽东思想红卫兵造反团。工作队撤出后她以极左的面貌出现，组织人到军事科学院去抢所谓的黑材料，冲击档案室并发生了严重冲突，打伤了军事科学院警卫

战士。而红旗战斗队的同学们是由“反干扰”期间挨整的师生组成，由于消息没有叶向真灵通，“红旗”成立比叶向真的红卫兵要晚，但红旗战斗队才是中戏真正的造反派。她还提出申请要求参加三司。第二天王敏陪同魏阳等人又到劳动人民文化宫来见我，并重述了王敏问我讲叙的情况。魏阳说他们学校被整过的同学至今都没宣布平反，黑材料也没退还。说到激动处甚至痛哭流涕。通过他们的叙述使我对中戏红旗的同学产生了极大的同情，因为我们也都是从那时候过来的，知道受压挨整的滋味。

这件事情引起了我的震惊和高度的关注。因为三司虽然成立最晚，但由于受到中央的支持而威望最高，影响最大，它虽然没有严密的组织机构，但总的原则是只吸收首都北京大专院校在刘邓路线中受压挨整而成立的少数派组织。使我对中戏文革产生兴趣的另一个主要原因是，叶向真的毛泽东思想红卫兵造反团已经在这之前，和她的丈夫刘诗昆一起带人到三司来闹过事，采取封门、刷大标语等方式，并扬言要踏平三司，说三司是黑五类的保护伞等等，后来她又以另外的脸色去找朱成昭，要求参加三司，我们也正在考虑朱的意见准备给叶的毛泽东思想红卫兵发三司身份证。而此时叶向真已经是我们东方红的一把手朱头的座上宾并有可能已经成为热恋中人。

这件事情非同小可。为了弄清事情的真相，我决定亲自到军事科学院深入调查了解中戏文革的真相。那时在三司核心组，清华井冈山老蒯也派出了一位和我一样身份的同学代表他常驻三司处理日常事务，事隔几十年忘了名字，2011年春节，为了写这个东西，特地给远在深圳的老蒯通了电话，这老弟记忆真好，还记得我的名字并热情约我去深圳，我说明了原因，他立马告诉我，那同学名字叫张云辉，北京人，清华数力系一年级学生，现为加拿大籍华人，常驻无锡，并告知了电话，使我和张取得了联系。我们在电话中互致问候，叙了别情，回忆了三司往事。

张云辉中等个子，当时常穿高腰皮靴，骑一辆捷克造佳瓦牌摩托车来往于三司和清华之间。他说他们学校摩托车多得很，他为了方便随便就借了一辆。我就邀请他一道跑一趟军事科学院，一来方便，他骑摩托车带上我就行了，二来搞外调二人同往也符合规矩（出了车祸后，我是不敢再单独骑摩托车了）。于是到办公室开了三司证明，我们二人骑摩托车来到了位于西北郊玉泉山下的军事科学院。卫兵看了介绍信马上打电话叫出了一个参谋模样的军人，把我们引入后院接待室，那时的三司名声极大，威望极高，一般的党政机关都不敢怠慢，三司被人们戏称为“第二文革小组”。

不一会从后面走出一位中等身材有些发福，年龄在四五十岁左右的首长，参谋介绍是胡主任，此人名叫胡秉权，到现在我还记得他的大名。大家相互介绍落

座后，我们就聊了起来。对话主要由我和胡将军之间进行，我开门见山直奔主题：我们来就是证实中戏红旗魏阳他们反映的有关叶向真和中戏文化革命情况。胡将军也毫不掩饰和盘托出。从他的话中证实了中戏红旗的同学介绍的情况完全属实：一、中戏工作队由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事科学院派出；二、工作队在中戏期间扶持成立了校文革领导小组，其组长就是叶向真；三、工作队在中戏领导运动期间也无例外地执行了刘邓错误路线，整了反工作队的少数同学，但在工作队撤出学校时，这些黑材料都全部移交给了叶向真为首的校文革（胡将军说，我们是军事机关，要那些材料有什么用呢？）；四、中戏以叶向真为首的毛泽东思想红卫兵来我们这里抢所谓黑材料并冲击军事机关档案室，是十分错误的，造成了极坏的影响。为了保卫档案室，我们的警卫战士手挽手组成人墙，他们有的人对我们战士大打出手，造成战士负伤，有的当场昏倒。但我们战士始终坚持打不还手骂不还口的原则。

我问胡将军，叶向真明知这里没有黑材料，那她为什么要策划这次行动呢？胡笑笑：赶时髦呗！表示自己是革命左派嘛！当时在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高潮时，确实有那么一阵抢材料的风气。与胡将军的谈话进一步深入，我又提出了一个更敏感的问题：为什么一个军事科学院这样的上层军事机关，要向一个八杆子打不着边的地方文艺院校派出文革工作队？这在全国可能也是一个绝无仅有的怪事。按照惯例，中央戏剧学院是文化部直属院校，工作队理应由文化部组织派遣，就像地院工作队由地质部派遣那样。胡将军对我的提问稍有迟疑后回答，军人以服从命令为天职，我们是奉命令而为。我又进一步追问：叶帅是你们的院长，向中戏派工作队是不是叶帅的意思？他的回答是否定的，但我注意到他在回答我这一提问时表情极不自然，并且岔开话题，语重心长，以长辈对晚辈的口吻嘱咐我们：万万不可将叶向真的问题和叶帅扯到一起，你们年轻人革命热情很高，但考虑问题往往不全面。

我和这位可敬的胡秉权将军再也没有见过面，但他给我留下深刻印象并留下了他的电话。后来在一次地质东方红将要采取重大行动，也就是炮打叶剑英的大标语、大字报即将上街的紧要时刻，我给胡将军去了一个电话，把我们的想法和将要采取的行动告诉了他，想听听他的意见。将军听到以后首先对我对他的信任表示感谢，并在电话中以十分紧迫十分关切十分诚恳的口吻劝导我和我的同学们千万不要走这一步，否则将会产生十分恶劣的影响，并一再强调叶向真的问题不能和叶帅扯到一起，头脑不要发热等等告诫的话。他的话对我产生了很大的影响，我将这个电话内容告诉了杨雨中。那时杨正在布置一个战斗队准备大标语和大字报，配合中戏红旗炮打叶剑英的行动。杨也听从了我的劝告，头脑冷静下来。其结果是炮打叶剑英的活动中东方红没有参加。这件事情发生在叶向真、朱成昭被于

桑带回北京被隔离审查以后。

从军事科学院调查回来后，联想到朱成昭最近一段和叶向真打得火热，平常接触中又发现他对中央文革首长，对肖力、江青出言不逊的作派，我感到发展下去十分危险。经过一番思想斗争，我决定将军事科学院调查之行的结果向朱成昭作一次长谈，并劝他与叶向真一刀两断。我也知道朱成昭的性格特点，但我还是决定要说出来，不说不符合我的性格，说了以后听与不听那就不是我的事了。

有一天的晚上，我来到了“上书房”，很郑重地向朱成昭说有一件重要的事要向他汇报。我将军事科学院调查等情况和盘托出，并将我对叶向真的看法以及中戏红旗兵团及其他文艺界人士对叶的看法如实告之，劝他远离叶向真，不要再与她来往。我当时是豁出去了，也不管你爱听不爱听，我也不看朱的脸色，一吐为快。当我讲完话，我看到朱成昭强压怒火，抽一口烟，对我解释：我们和叶向真来往主要是想更多了解中央高层路线斗争的信息，避免多走弯路。我立马反驳他：我们不是可以通过肖力这条线更及时、更准确地了解上层路线斗争的信息吗？老兄，实践证明，我们东方红在这之前所走的每一步都得到肖力的点拨，并且每一步都取得了伟大胜利。

朱成昭见我肖力来噎他，勃然大怒，猛一下站起来，脸色通红，说：“田春林你以后在我面前少提肖力！”

我说：“肖力怎么了？有哪些地方对不起你朱成昭和东方红了？”

朱成昭对肖力的恶劣态度当时使我感到十分震惊。接着他对我下了最后通牒：“田君，你以后可以继续支持中戏红旗，我以个人名义支持叶向真的毛泽东思想红卫兵。”

话说到这个份上，已经谈不下去了，于是我告辞退出，二人不欢而散。

这就是我和朱成昭的分手。后来他先告诉了伏庆是。他知道伏和我关系密切，叫伏转告我：若再干预他和叶向真的事就白刀子进红刀子出。当然他这是放的狠话。这事直到2011年3月12号我和伏庆是在武昌聚会时，伏还对我提起，蒋良朴也在场。

这就是我和朱成昭分手的全部真相。这就是为什么以后的朱成昭周围少了一个田春林，为什么在“叶朱集团”中没有田春林的名字。因为受到我的劝告和影响，我的同班同学也是朱的上海老乡的伏庆是，在朱的问题上也涉足不深，避免了牢狱之灾。

朱成昭的叛逆对“无产阶级司令部”确实造成了一定的伤害。在一次中央文革的接见会上，江青曾无奈地说，地质东方红是我们树立的一面旗帜，朱成昭不行了，但东方红的大旗不能倒。叶、朱从1967年4、5月份被隔离审查，不久逮捕入狱。两个人虽同时入狱，但处境却大相径庭。我注意到，中美关系正常化之

后，1973年9月，美国著名的费城交响乐团来华访问，报上报道了陪同周总理和江青接见乐团的文艺界人士中出现了刘诗昆的名字。刘诗昆是叶向真的前夫，也是“叶朱反革命集团”重要成员。后来听说叶向真也已经出狱获得了自由，出来后先改行到北医学医，毕业后分到301医院当医生。我当时就想，朱成昭也很快就会获得自由了。事实证明，我太天真了，我对中国的政治现实的认识太肤浅了。朱成昭一直到1980年，在中国政局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之后，由胡耀邦的亲自过问才获平反出狱。

1980年，地院已南迁到武昌喻家山下新址，张海涛给我来信，说他在学校招待所正等待学校的平反结论。风雨沧桑，多年不见很想见我一面，并告诉我朱成昭、老蒋他们已平反，也在学校等待分配。接信后我来到学校，先是见到了张海涛，后来到朱成昭住处。大家已分别十三年了！互相之间问候、叙别自不说，我看到这几个哥们十几年的牢狱之苦，九死一生出来后精神、身体都还不错。和朱成昭交谈中，有一个话题他不提，我更不敢触及，那就是叶向真。

到了上世纪九十年代初，朱成昭被单位派驻上海开发地质工程市场。这时正值浦东大开发，朱成昭第二次人生的机遇来了，他利用工作之便联系了不少工程勘察和桩基工程，也有了自己的公司，埋头苦干几年后可以发笔大财。那时我和他通过电话，当得知我已调回河南的工程设计单位作工程勘察和地基处理工作，他想约我去上海发展，而当时我们这里建筑市场也很火爆，我也是单位这方面的技术负责人，走不开。当时地质队比较萧条，很多地质队没活干，我就撺掇伏庆是租借一台单位的钻机去上海，并给伏寄去了有关工程地质方面的规范规程等资料。后来伏就从单位租了一台钻机赶到了上海。一个月后伏又给我打电话说他已经回到湖南，我问他为什么？他说朱成昭根本不是经商的料，初开始也确实挣了不少钱，工程也不少，但是由于当时三角债问题，加上管理不善公司坐吃山空，很难为继。要命的是又有两个女人纠缠住了朱成昭，把他弄得神魂颠倒，甚至把公司财务大权交由一个相好的来管。最后连设备和现金都被席卷一空，朱成昭还叫伏和他一起到一个棚户区去找其中的一个小秘。但按照地址去找，根本没有这个人。

朱成昭出狱后回到上海，找了一个老知青结了婚，并生了一个儿子，后由于朱在外面胡混导致两人离了婚。朱的第二次人生机遇又没把握住，最后弄得穷困潦倒。后由梅建民引荐认识了研究文革的某外籍华人记者。由这位媒体人资助来到北京，住在昌平十三陵的农家院里写文革回忆录。这时的朱成昭已经心力憔悴。1999年我到北京梅建明处看到他去世前在北京的照片，只见人已脱了形，连1980年出狱时的精神状态都不如，瘦得可怕。朱在1998年下半年突然猝死在十三陵寓所。后朱德瑜等同学为他料理了后事，因朱成昭没有丝毫积蓄，让我们老同学

给予支持，我当时也因身体患了小中风不能前往，为表心意寄了点钱去。后来和老蒋聊起这事，他说朱去世前半夜还和他通了一个多小时的电话，后半夜就暴亡了。朱在去世前，精神抑郁，情绪失控，有病从来不去医院看，去世时年仅 56 岁。

谁举报了朱成昭

这个话题对我来说有些沉重，我曾经想回避，让它烂掉在我肚子里。经过思想斗争最后我还是决定揭开这个谜底。

我要告诉大家的就是：向中央文革肖力写信举报朱成昭的是张海涛，我是知情人和递信人。

已经四十多年了，两位当事人都已作古，对于我来说也可能以后再也没有机会讲了，我想既然是还原历史，那就要本着“知无不言，言无不尽”的原则，毫无保留地将回忆得起来的事交代清楚。过去在隔离室交代是被专案组高压下逼着，现在自觉自愿的氛围里更不能有所隐瞒，况且大家都已经站在同一个平台上去回顾历史，大家已经度尽劫波兄弟在，相逢一笑泯恩仇了。我想如果张海涛没有去世，他对我们这次回忆和反思地院文革史的活动肯定会积极支持，热情参与，实话实说的。

关于这个话题，圈内有各种说法，我听到的有三种，第一种说法是王大宾向中央文革揭发了朱成昭，道理显而易见，不用我多解释，他当然是最大的嫌疑人；第二种说法是朱的反对派“二团”的蔡新平、周永璋，联合校外势力蒯大富、聂元梓、韩爱晶向中央文革揭发了朱成昭反中央文革的情况；第三种说法是学校陶世龙老师等人写信检举了朱成昭。

在将这件事全过程交代给大家之前，首先我将张海涛的情况以及我和张在文革中的关系说一说。

张海涛，东北辽宁人，1933 年出生，家庭出身佃农，按照毛泽东阶级分析的理论，这个出身是革命坚定的依靠对象。虽然家里很穷但还是咬着牙供他读完了小学，这在当时也算是村里的文化人了。1947 年东北民主联军也就是林彪的第四野战军的前身解放了他的家乡，他仅 14 周岁，坚决要求参军，凭借他人聪明又有些文化底子，被部队破格批准入伍，这个人的优点是勤奋好学，求知欲很强，特别崇拜文化人并且也想成为一个文化人。在部队他主要的工作就是文化教员、文书之类的写写画画，这对他自己文化水平的提高大有帮助。解放后，部队掀起了向文化进军的高潮，他如饥似渴地学习文化知识并取得优异成绩，被保送到中国人民大学工农速成中学学习，1956 年考取人大哲学系马列主义专业。哪

知流年不利，赶上了 1957 年的“反右”运动，因为他为大右派林希翎说了几句公道话，在“反右”运动结束时被取消了党员预备期，文字结论是“同情大右派林希翎”。他原来是部队带职的调干生，原定毕业后回部队，并在 1955 年军队授衔时已被授予中尉军衔，就因为这个“污点”改变了他的命运，改为由地方分配。当时他爱人已从部队转业到清华无线电系作实验员，照顾关系把他分配到北京地质学院政治教研室工作，后来地院成立了附中，他又被以加强附中教师队伍为由调到附中当语文教员。在附中由于工作努力，教学成绩突出，又一次在薛玉峰等人的介绍下重新入了党。

张海涛给我的印象是人很勤奋，爱动脑子，遇事喜欢动笔记下来，这本来是个好习惯，但在那个血腥的年代却往往给人带来灾祸。空军军宣队进校的 1968 年秋天，他是第一批被隔离审查关进军队自建监狱——西四楼校医院的三楼里的。后又被正式逮捕送进了秦城监狱，直到粉碎“四人帮”才出狱。在“6·20”事件后几天全院反邹家尤工作队的日子里。附中曾出现一张反工作队的很有名的大字报，落款的署名为“玉万海瑞”。在“反干扰”时，附中和地院有人把这张大字报与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联系上了，说他们是为海瑞翻案，是和姚文元唱反调，为当代海瑞彭德怀翻案。这件事在“反干扰”中，在地质学院几乎人人皆知，我对这件事印象深刻，心想附中还真有人如此大胆敢为彭德怀鸣冤叫屈。后来认识了张海涛，才知道真相。原来，“玉万海瑞”的署名是取写大字报的四位老师名字中间一字组成的笔名，这四位老师是薛玉峰、刘万祥、张海涛、单瑞康，而排列的顺序则是按入党的先后。没有经过那种年代的年轻人，不可能理解那个年代会有多么荒唐，人们的思想会有多么病态。这四位老师在“反干扰”时都受到了口诛笔伐的批斗和迫害。后来到了 8 月份，成立了东方红公社，这四位老师中除了单瑞康老师以外，其他三人都是东方红公社红教联的积极分子，其中薛玉峰老师后来参加了首都中学红代会核心组的领导工作，并被结合进了北京市革委会作了委员，而张海涛成了我们东方红公社红教联核心组成员并进了公社领导班子，我就是在那时和他相识并相知相交的。

我和张海涛相识以后接触慢慢多了，发现我们在对文革的许多重大问题的认识上有共同语言，因此关系愈加紧密，个人关系也成了无话不说的朋友。我们成为朋友的另一个原因，是他的爱人骆辅琴大姐是我的河南老乡，骆大姐是一个非常典型的贤妻良母，河南商丘人，也是建国前参军的，属于河南的地方部队。吴芝圃是她们的首长，后编入中原野战军。解放初中共中央在长春建了一个机要学校，专为中央培养机要人员，可见进这个学校政审上是非常严格的，而她能进这个学校说明家庭出身和社会关系都经过了严格的审查，但是这个学校只办了两期，第一期的毕业生大都进了中央直属机关作机要工作，像后来成为毛泽东机要

秘书的谢静宜就是早一期的学员，而骆大姐她们却都转业到地方，由地方分配，她分配到清华大学无线电系作实验员。张海涛在地院附中没有住房，清华给骆辅琴分了一个平房大杂院的筒子间，地址叫做第六宿舍，小两口就蜗居在这里几十年，直到八十年代中期清华才给骆大姐分了一套一居室的单元房，还在七层的顶层。不知从什么时候开始，每逢星期天、节假日，他们在清华的蜗居地成了我经常光顾的地方，不用说每次去少不了吃饺子，喝小酒。记得后来孟繁华同学也加入我们的行列，每次我都约孟结伴前往张家打牙祭。

1967 年的元月份，外出串联的同学陆续返校，朱成昭等人也从地质部撤回学校住在三层最东边一间教师宿舍内，我把它叫东方红的“上书房”，是朱头的卧室兼会客室，除去学院内部的人进出之外，每天进出的还有校外一些中学生联动分子，来得最多的是叶向真。叶向真是否到来有一个明显标志，就是她有一辆灰色伏尔加轿车代步，只要楼下停一辆灰色伏尔加，她一准在朱头那。有时一停就是大半夜。朱头这时的思想已发生了巨大变化，他深居简出，很少露面，不再过问学校运动和东方红的具体事务，张海涛也到他那里去交谈过，发现他对文化大革命，对中央文革都进行攻击和不满，我也将到军事科学院外调，叶向真冲击军事科学院档案室，叶向真在中戏文革中的表现等情况说给张听，最后我们达成一个共识，那就是朱成昭由于自己的父亲受到冲击和叶向真对他灌输的中央高层的斗争情况，朱成昭已经走向或正在走向自己的反面，发展下去很危险。

有一天，张海涛对我说，准备给肖力写一封信，反映朱成昭近来思想的变化情况，引起肖力的注意，我们这些话他听不进去，中央文革、肖力的话他不敢不听吧？过了几天信写好后，张海涛找到我，把这封信的全文读给我听，信的标题是《关于朱成昭近期思想变化的汇报信》，全文大意是：

朱成昭近期产生了严重的骄傲自满情绪，自以为是。在一次和我的深入谈话中，他想当然的认为中央高层现在存在三种政治势力，第一是毛林为首的文革势力，周总理为了保自己是紧跟毛林的。毛要依靠林对军队的控制打倒第二种势力刘邓。第三种势力是以康生为首的中央文革笔杆子势力。康生是有野心的，他现在依附于毛林的主流势力，利用毛打倒刘邓的心理将他推向极端，使毛走向反面失去民心 and 军队的支持，从而夺权。他说外国就有这样政变的例子。当然也有可能毛在达到打倒刘邓的目的以后为了收拾局面，消除广大干部和军队的怨气，把文革派和康生抛出来作替罪羊。因此他认为造反派别看现在闹得欢，终究会和中央文革一样被抛出来当替罪羊。最后掌权的还是保守派和枪杆子。因此他在行动上由原来反联动到和联动打得火热，并把宝押在所谓枪杆子上。

尤其是他的父亲在上海一月风暴被群众揪出来受到冲击以后，他对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对毛主席的革命路线产生了怀疑和动摇，经常对群众运动发牢骚，

散布对运动攻击和不满的言论，他放言说就是坐牢也要和中央文革斗到底。他甚至放肆攻击中央首长，对中央首长的接见也拒绝参加。他与那些被处理过的中学联动交往密切，这些人经常出入他的房间，他与中央戏剧学院保守派组织毛泽东思想红卫兵的头头叶向真关系密切，两人经常闭门长谈，甚至彻夜密谈，叶向真的影响是他思想变化的重要原因，两人关系很不正常。这些人还可能有经济问题，生活腐化，几乎每天下馆子大吃大喝，高级香烟不离手。

张海涛的信最后说：我们写这封信主要目的是希望肖力同志和中央文革首长对朱成昭的情况引起注意，能够批评他，警告他，使他能够幡然醒悟，悬崖勒马，改正错误，继续带领地质东方红这支队伍沿着毛主席的革命路线前进。

信的落款署名是“地质东方红红教联张海涛”。

以上就是张海涛给肖力举报朱成昭信的主要内容。因为事关重大，虽然已过去四十多年记忆仍比较清晰。读完信，张海涛向我征询意见，我说可以。然后他就重新把信折叠好装进信封交给我，要我在首长接见的时候递给肖力。他没有要求我共同署名，因为他知道，我既然能将信交给肖力，本身就表明我的态度，有关信中反映的问题肖力也会向我当面问明。

那段时间，无论是在三司或是后来的红代会，作为核心组成员，每当有中央首长接见活动，总有列席的入场券给我们送来，所以见中央首长的机会很多，而且几乎每一次这种接见会，肖力都会出现在群众座位当中，她跟很多高校的头头都很熟。也有不少外地来京上访的群众通过熟人关系委托我们向中央首长转交信件。

过了几天，在一次人民大会堂的首长接见会上，我见到了肖力，把张海涛的信交给了她。又过了几天的一次接见会上，当我刚找一个位置坐下，远远看见肖力在向我招手示意，叫我到她那里去坐。当我穿过人群坐到她旁边，两人就聊了起来。她先问我张海涛的情况，因为之前肖力并不认识张海涛，她到地院来主要接触的是她在东方红早期认识的学生成员，我向她介绍了张海涛的有关情况，后来她又问了朱成昭和叶向真的有关情况，我都将我知道的情况如实相告，因为熟了，说话有些随便，我笑着说：“叶向真可比你有派头，进出地院都是以伏尔加代步，还有专车司机。”她略加停顿说：“我们就不是一路人。”

从肖力接到张海涛的信以后的情况来看，我估计张信肯定已引起肖力的高度注意。当然也不排除她从其它渠道了解朱成昭的思想动向，比方微服私访，来看大字报，因为对朱成昭反中央文革的动向，当时地院的“杀猪（朱）派”在大字报上已有所反映，或者也有人写信反映了朱的问题。不久，在1967年1月23日，中央文革办公室王广宇传达了陈伯达对朱成昭问题的批示：“过去关照你们，现在还有责任来和你们打招呼。听说你们要搞中央文革，还要斗到底。”“一定不

要这样，不要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我们是无所畏惧的，招呼你们是为了照顾你们，如果你们不听，那就要陷入泥坑里去，那是自作自受。”从内容和态度看，可以肯定是肖力接到了张海涛的信并综合其它方面的信息向陈伯达作了口头或书面的汇报，也只有肖力这种特殊身份的人的话才能引起陈伯达有如此强烈的反应。请大家不要忘记，肖力是陈伯达亲自签署便笺派往地院的文化革命观察员。应该说，肖力与朱成昭也是非常熟悉的，对他和叶向真接触并走向叛逆，肖力是十分痛心和反感的，但从陈伯达的批示看，对朱成昭还只是一种警告和批评，再从3月5号戚本禹在政协礼堂接见地院东方红部分同志时的讲话中，要朱成昭“闭门思过，学习文件，学习毛主席著作，认真检查”来看，对他还是一种挽救的态度，从张海涛写信的本意来看，也是想让肖力和中央文革出面来批评他，警醒他，挽救他，并没有想一棍子把他打死。

但事情的发展并没有人们想的那么乐观，朱成昭发展到抛出“八大观点”公开对抗，又南逃广州，最后惊动周恩来命公安部于桑副部长出面从广州带回北京，从此投入大狱，九死一生十三年。

事情已过去四十多年，三位当事人中两位已经去世，今天我第一次将这个秘密展示在同学的面前，再现那段历史，无论同学们如何评价我，总算对历史有了一个交代。

关锋给我的一次电话记录

有人从宋永毅主编的《中国文化大革命文库》里看到1967年8月9日关锋给我的一次电话记录，内容是：

田春林同志：

听说你们那里因为地院革委会确定朱红、黄占启两同志随我去一趟的问题有很大的争论，我希望不要因为这个问题引起争论，妨碍掌握斗争大方向，既然争论很大，这次你们那里可以不去人。

希望你们紧紧掌握斗争大方向，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坚持在毛泽东思想基础上的团结，发展和巩固革命的大联合，把斗争矛头指向党内最大的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搞好革命的大批判，同时把朱成昭批深批透。你们那里批判朱成昭和大方向一致。8月2日，你向我提出一些问题，我讲了几句话，大致也是这个意见。

关锋

八月九日

关锋说的8月2日这个具体时间我不记得了，反正是在人大会堂开一个群众大会，我作为红代会常委上主席台，座位与关锋相邻，跟他聊了几句，主要是我向他口头汇报学校当时揭批“叶、朱反革命集团”的形势——当时叶向真、朱成昭已经被于桑从广州带回隔离在地院十二楼，全院以二团为首的“杀猪（朱）派”掀起揭批叶、朱高潮。关锋在跟我谈话中强调要“追后台”，这使我感觉是不是想把矛头引向叶帅？他没明说，我也没多问。

当时，造反初期的老东方红战斗队很多同学对朱成昭倒台在感情上难以接受，但与朱决没有反文革的思想共鸣和行动的跟进，这些人被当时“杀猪派”戏称为“啃猪蹄”的，还是朱派。这完全是派性使然。关锋这个电话记录中提到的黄占启和朱虹（电话记录中写作朱红）就属这种情况，黄是周永璋一班的，“反干扰”中也被工作队整得够呛，后来是东方红战斗队骨干，地院革委会成立后任地质系分会副主任；朱虹是水文系一年级女生。当时关锋准备到外省去处理一个派斗之事，地院东方红在当地影响较大，关锋就准备带两个东方红战士一起去协助他工作，派谁去的名单是地院革委会推荐的，“杀猪派”知道后强烈反对，说他们是“啃朱蹄”的，贴了一些大字报，从而使这事取消了。

大概关锋那次打来电话时我不在，就由接电话的人做了这个记录。若不由知情者加以说明，以后的人就很难明白这个电话记录里说的是什么事。

我被清洗出革委会的经过

事情要从1967年成立院革委会说起，院革委会成立时，王大宾很自然成为主任，当时他已是市革委会常委、红代会副主任。我因为是东方红公社创始人之一，和朱成昭案又没有什么瓜葛，自然也就进了革委会成为常委。因为我在三司工作过，与外校的同学较熟悉，就又被王大宾派到红代会，代表地院东方红进入红代会核心组。每天骑自行车来往于北大和地院之间（红代会设在北大俄语楼）我住在学九楼顶楼最西头的一间屋子，和伏庆是同室，住室内设有电话，和外界联系很方便。

我们系五年级有一个同学陈家庚，福建人，他当时联系校内外及中学红卫兵，成立了一个批判毒草电影联络站，当站长，设在西单的中国电影家协会院内。陈家庚后来的夫人李冲那时是中学红卫兵，参加批影联络站而相识相爱的。我们学校还有张吉顺等人参加。陈家庚隔三岔五给我送来电影票，因为要批判毒草电影就要先看毒草电影，在那个时期我和伏庆是没少看不花钱的电影，与其说是批判不如说是欣赏，或者打着批判的幌子欣赏电影艺术，想看什么电影打个电话他们

立马可以调出拷贝拿来放映，像苏联电影《静静的顿河》《白痴》《白夜》，国产电影《武训传》《早春二月》《林家铺子》等。

大约在1967年10月的一天夜里，陈家庚到寝室来找我，表情很严肃，说是有一个事需要我帮忙。他有个亲戚名叫郑公盾，在红旗杂志社工作，郑是他姐的前夫，郑跟他姐共生有三个子女，老大郑伯农在中央音乐学院工作，老二郑仲兵在民族学院工作，老三是女孩叫郑立中，就读于哈军工。这三个外甥都很有出息，虽然郑公盾已和他姐离婚多年，但三个外甥跟他常有来往，关系很好，而郑公盾在经济上对他读书也有些接济。他介绍说郑公盾是个文人，解放前毕业于杭州大学，后从事媒体方面的文字工作，三十年代和江青也有过交往，因为英文基础较好，解放前曾供职于美国驻华新闻处，解放后进入红旗杂志社作文艺评论方面的工作，常在杂志和报纸上写一些评论文章。文革中曾任中央文革文艺组办公室主任。可能是在杂志社内部的派系斗争中站错了队，得罪了人，在美国新闻处工作的历史问题被翻出来，不知什么人向江青打小报告说他是美国中央情报局特务，在最近的一次接见会上江青点了郑公盾的名。使郑公盾陷入了困境，处于被软禁状态。陈家庚说郑公盾有一封说明情况的申诉材料想通过我转交中央文革江青同志。因我是红代会常委，经常参加一些外交应酬活动，见首长的机会比较多。我平常和家庚关系不错，他既然提出来了，我也就没多加考虑，就和他还有伏庆是三个人一起搭公交车来到沙滩的红旗杂志社家属院。门卫看到我们戴着红卫兵袖章也就没阻拦。到了郑公盾家里，除了郑公盾还有他的现夫人在家，因为事前陈家庚已将我们要来的消息电话通知了他，进门后大家不用介绍就在客厅落座。郑公盾将自己的经历叙述一遍后又说，美国新闻处是没有官方背景的纯粹新闻社团，在世界各国都设有分支机构，与中央情报局没有什么关系。自己到那里工作纯粹是为了混口饭吃，三十年代在上海工作已经加入地下党，思想上还是进步的，不知怎么突然冒出个美国特务的帽子扣在我头上，自己这段历史解放后已多次向组织交待过并没隐瞒什么。正在这时，从外面进来十来个人说是来抄郑公盾家的。带队的是北京电影制片厂造反派头头石洗，此人后来在电影《李四光》中饰演李四光的学生。我和他虽没打过交道，在首长接见时见过面，也面熟，何况我又戴着红代会的袖标。互相打过招呼后，他见我们已先到一步，也就没采取行动，也没停留就退出去了。我们和石洗并没发生冲突。

时间很晚了，我们怕搭不上末班车就告退出来。临行前郑公盾交给我一封信，收信人是江青，落款为郑公盾。

不久，西哈努克亲王为庆祝柬埔寨国庆举行了一个小型招待会，宴会在人大大会堂二楼小宴会厅，我作为红代会常委应邀出席。会上遇到陈毅，我们坐邻桌。宴会结束时我将郑公盾的信交给了陈毅，他满口答应说一定转交江青同志。

我和郑公盾的接触仅此一次，为他办事也仅此一件。那时为下面或外地上访群众向中央首长转交信件是再平常不过的事了。因为我们那时的特殊身份，见中央首长的机会是很多的。

1967年11月30日下午，院革委委员、地质系革委会主任刘佛兴来到我的住处通知我去眷属区眷8楼周守成的住处开会。周守成已搬出了这个独立二层小楼，我说怎么不在会议室开，他说天冷，没暖气，周守成的二层小楼有小锅炉可以独立供暖。我就信以为真跟随着刘佛兴来到眷8楼周守成原住处。当上到二楼会客厅后，刘佛兴啪的把门反锁上站在门后，这时走出四五个地质系一年级的同学，刘佛兴从身上拿出一张纸对我宣布：北京地质学院革委会决定，从即日起对田春林隔离审查。我当时就急眼了，扑上去揪着刘佛兴的衣领大骂。预先安排好的那几个同学上来把我扯开，刘佛兴也走了。不一会那几个人去学九楼把我的行李也搬到了隔离室。从此我被聂树人、李贵在这里隔离了一个月整。

一个月后，当我走出隔离室，同学们告诉我在隔离我的当天晚上，学九楼门前的大字报栏就贴出了大标语，内容是“揪出反革命分子郑公盾伸向地院的黑手”、“打倒反革命分子郑公盾在地院的代理人田春林”等等，看来李贵、聂树人对我下此狠招是作了充分准备的。我的专案组成员就一个人，名叫陆焱德，是探工系教师。被隔离后三四天都没人理我，在第五天陆焱德来到隔离室找我谈话，吓唬我说郑公盾案很大很严重，与郑接触过的人都要接受审查，要我老实交代争取宽大。我也吓得够呛，就将那天晚上和陈家庚到郑公盾家后又替他转交一封信的情况如实交代。交代完了后又是好几天没事。我要求见李贵，因为王大宾已经到鞍山汤岗子温泉治疗风湿病去了。但李贵在我被关押一个星期之后才姗姗来迟，我问他到底为什么，他闪烁其词，说隔离我是周总理的批示，我让他拿批示给我看，他拿不出，又说是总理的讲话中点了我的名，说我是郑公盾反革命集团伸向地院的黑手云云。在郑公盾问题上又重复了陆焱德和我谈的内容，然后就试探性地问我和高元贵的关系，和二团的关系。狐狸尾巴终于露出来了！我就具实告知：本来我和高元贵、二团的接触都是正常接触，也没什么见不得人的，而且我也公开声明在对待校内外运动问题上支持二团观点，并且曾建议吸收蔡新平进革委会，与我持同一观点的有张海涛、高元贵、黄振群等革委会委员。有一次在李贵家里开常委会，就这一问题发生严重争论，聂树人和张海涛拍桌子大吵。聂指责张是二团观点的代理人，这位东北汉子忽地一下站起来说：我就支持二团，看你把我怎么样！说完话，甩手而去，搞得会不欢而散。张这句话给自己留下了祸根，在这次大清洗中他被以是附中的人，关系不在学校为借口赶出了革委会。而隔离室期间，朱成昭专案组组长李思田找过我两三次，当然他关心的是我和朱成昭的联系，来了两次见从我嘴里问不出什么有价值的东西，也抓不到什么把柄，

就没有再来。后来听说这位煤田教研室老师、朱成昭专案组组长在抓5·16运动中也被揪了出来，说他是真5·16分子，假抓5·16。曾经被逼触电自杀，因抢救及时没死成，不然就是第二个李明哲了。现在他是著名的煤田地质学家、博士生导师了。

隔离室后半个月很有意思，看守我的学生全部撤出，换了一个工人日夜陪我，开饭时他给我打饭，晚上与我同室睡觉，其余时间是陪我聊天下棋。聊天中知道他原来是前任院党委书记刘邢的警卫员，跟随刘邢从部队转业来到地院，刘调走后他留了下来，家也安在了地院。因天津战役中下身受伤，睾丸打坏了，至今没有生育。最后我们成了无话不说的朋友。

1967年的12月31日这一天我永远不会忘记，在我被隔离整整一个月后，我们班上的张绍宗、张金生两位同学来到隔离室，帮我拿行李回班，说是院革委会通知班上把我接回班，院革委会没有任何人和我见面宣布解除隔离。于是我就和他们一起重新回到南五楼514室我们11631的宿舍，回到了同学们中间，过起了逍遥派的生活。伏庆是照样当他的革委会委员，办公室主任，我问他隔离我的决定开没开会研究，他说根本就没开会，那天晚上他也去了郑公盾家，怎么没隔离他？除了聂树人、李贵、刘佛兴三人之外，其他委员都不知道要隔离我的事。只是我被隔离后出了几幅大标语才知道我被隔离了。

后来我在1968年夏天军宣队进校后见到陈家庚，他也刚从隔离室出来，被关了半年多。而郑公盾在我们之后被逮捕关押在秦城8年之久。这次革委会大清洗的结果，高元贵被定为死不悔改的走资派赶出革委会，交群众批斗，张海涛以关系在附中为借口赶出革委会，我是因“郑公盾黑手”清洗回班当上了逍遥派，黄振群被清除的借口是什么忘记了。通过这次清洗，“纯洁了革委会，打击了走资派的复辟阴谋，清除了二团的代言人，院革委会政权得到了空前巩固”。后来又闹出了自己批准自己入党，成立院党委会，李贵顺理成章当上了党委书记，王大宾、聂树人也入了党并进入了党委班子。不久在1968年的冬季，在新的院党委和革委会的英明领导下狠抓阶级斗争，轰轰烈烈的“清理阶级队伍”运动开始了。

在聂、李清洗反对派，改组革委会的那段时间，王大宾在东北汤岗子温泉疗养，等他回来一切已成了事实，王大宾事实上已变成汉献帝了。地院的这些变化，连中央最高层都有所察觉，在毛主席接见五大领袖时就问王大宾，“听说你的二把手夺了你的权是这样吗？”指的就是这件事。

地院文革中四个最黑暗时段

纵观地院十年文革史，有四个最黑暗的时段。

第一个黑暗时段是“反干扰”，发生在1966年6月20日至7月底，是由地质部邹家尤、边固工作队造成的，没有逼人至死的记录。

第二个黑暗时段是第一次“清理阶级队伍”，发生在1968年元月至2月间，是由王大宾、聂树人、李贵的革委会领导下进行的，王大宾虽不是直接操作者，但负有领导责任。

第三次黑暗时段发生在1968年的秋冬之交，是由空军大院毛泽东思想宣传队即军宣队的牛润五，林凯领导造成的。

第四个最黑暗的时段是1970年下半年开始的抓5·16运动，也是由军宣队导演。这次的特点是第二次的整人者一个不剩地进入了重点被整和打击对象，像王大宾、李贵、聂树人等头面人物都成了抓5·16的重点人物，而他们之前的战绩被认为是真5·16假抓5·16的行为。当然像我这样的早就列入另册的人和他们殊途同归了。

这次抓5·16的另一特点是，文革前入学的学生已全部分配出去，像我一样大部分学生是走上社会后被整的，也有被逼至死的记录，像探工系的李仲学。而校内的代表人物是李明哲，这位才华横溢的青年教师被逼死在江西峡江的野山上，死后数日才被发现，尸体已高度腐败成了副骨架。

建议这次文革资料征集小组把地院文革十年中被整死的人作个统计，目的不是追究谁的责任，而是为了将来我们的后代子孙们回头看这段血腥的历史会加倍珍惜得之不易的幸福生活，也可以使像王鸿夫妇们那样冤死者的后代子孙们可以“家祭无忘告乃翁”了。

在聂树人、李贵的大清洗中，最惨的是高院长，他被定为死不改悔的走资派交给各班级战斗队轮流批斗。在我脑子里就清晰地定格着我们班批斗高元贵的情景，那天我们班参加劳动，在南五楼与航院交界的菜地拔草，劳动间隙里批斗也和我们一起劳动的高老夫子，我们班的刘××上去给老人家架喷气式，当时高已是年届60岁柔弱的老人，真不知道老人家是如何挺过那段凄惨日子的。此情此景使我终生难忘。

【故纸堆】

对一次戚本禹接见北京地院同学讲话的说明

蔡新平

《昨天》编辑部把1967年3月5日《戚本禹接见北京地质学院东方红公社

部分同学的讲话》发给我了，鉴于我是当时接见的重要当事人，有些内容直接与我有关。希望我对这篇 1967 年的文革文献的背景做点说明。由于这已是 48 年前的事情，只能凭有限的记忆做一点简单说明。我正在撰写回忆录，回忆录中对此阶段发生的事情和这次接见将会有更丰富的解读。

这是戚本禹 1967 年 3 月 5 日在政协礼堂接见北京地质学院东方红公社的会议记录，原载于宋永毅主编的《中国文化大革命文库》光盘上的版本。读后发现该记录有遗漏和错误。记录是谁做的？不清楚，总的感觉虽有倾向性，但基本情况如此，资料很宝贵。我根据自己的记忆做了一点修订。订正部分用粗楷体加下划线标出。

1967 年 3 月 4 号深夜，大约 12 点都过了（也就是 3 月 5 号凌晨了），在睡梦中突然有人通知我去开会，说有中央文革首长接见。等我到了政协礼堂，才发现来开会的约有将近 50 人（当时有统计，我印象是 48 人），我们这派的骨干只有四个人：殷惟侯、孙司权、杨淑荣和我。其他多半是另一派的。朱成昭、蒋良朴、王大宾、朱德瑜等东方红公社领导班子的主要成员差不多都到场了。戚本禹带来的是周景芳，不是该记录上的什么朱金堂（此人我从来没听说过）。周景芳参加北京市夺权，正在筹备市革命委员会，被戚本禹派来地院指导筹建地院的革委会。北京市革命委员会成立后周景芳是市革委会秘书长。地院革委会开始成立时叫东方红革命委员会，比市革委成立还要早，大概是北京市最早的，后更名去掉了“东方红”三字。

当时的背景是：北京地质学院东方红公社已经分成了两派，以朱成昭为首的被称朱派，以蔡新平（东方红公社核心组成员）为首的被称蔡派。分歧最初从“二进地质部”开始，早期仅仅是一些斗争策略问题的分歧，是激进些还是保守些、稳妥些的分歧。但因朱成昭的刚愎自用和对持不同意见人的不当组织处理，导致矛盾逐步升级。朱派把蔡派称为右倾机会主义分子，展开批判，当蔡派发起反击后又被认为是搞分裂，进一步扣上“托派”的帽子组织批判。蔡派则认为朱派是极左派。大约在 1966 年 12 月份前后，朱成昭反中央文革的言行逐渐暴露出来，矛盾的性质开始发生变化。1967 年 1 月上旬，朱成昭被内部知情人将其反中央文革的言行向肖力举报了，1 月 23 号陈伯达发出批评朱成昭的批示，警告他不要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已经滑到了茅坑的边缘。在中央文革的督促下朱成昭先后做了两次检查。2 月 4 号借检查之名放出了他的著名的八大观点。很快，中央文革 2 月 8 号就派阎长贵来地院，针对朱的所谓检查有明确的讲话，总的思想是要批判他，但不要过火，还是人民内部矛盾，还想挽救他。经过近一个月的观察，朱成昭不仅没有服软，而且还有新的动作，中央文革终于对他完全失望。3 月 5 号这次戚本禹接见时，朱成昭、蒋良朴都在场。戚接见讲话总的精神就是

扶持王大宾来取代朱成昭，推动地院革委会的建立，使王大宾的领导班子合法化，不被反对派干扰，使地院东方红还可以继续有效地为中央文革所用。这时中央文革对朱成昭已经决定放弃，戚本禹讲话中接着朱成昭的话头说：“他们要夺权，如果只夺你的权可以嘛！你的权就是要夺嘛！”已表明态度。但又不想让他生事，也不想因批判他而激起更大的事端，这既毁了地院东方红的名声，实际也有损中央文革的名声。所以才说让他闭门思过。但朱成昭的思想在闭门思过期间走向更加的极端，和叶向真的关系也进一步发展，到6月逃跑，7月9号从广州被公安部抓回北京。

戚本禹接见时有一个极重要的提法：“蔡新平，你可以自己组织自己的人整风”，他说这句话后我马上有个插话，我说我也是东方红的，我们是内部的两派。所以才有后来戚本禹一句：“当然，如果蔡新平要求也可以大家一起整风。”这是原纪录的一个关键的遗漏。这句话表明戚本禹已经将我排斥在东方红总部之外，甚至认为我们这派最好从东方红分出去，以免干扰东方红的革命委员会的建立。所以后来在革委会选举时，因为在一半以上的班级和多数教研室，蔡派都是多数（过去的保守派大多倾向蔡派），若按大民主选举，一人一票，其结果对王大宾和革委会的建立极为不利。在僵持不下时，周景芳内部传达了戚本禹的指示：“蔡派不许进入革委会。”这就不是偶然的了，说明中央文革早有考虑。后来按周景芳的指导，改变了选举方式。虽说是“公社”，但从来没有什么真正的“巴黎公社式的选举”，所谓“大民主”也只是一句空话而已。

以1967年3月5号为界，北京地质学院东方红公社由朱成昭时代改为王大宾时代。用王大宾接替朱成昭是中央文革的既定方针。从此蔡派受到了革委会的压制。对于王大宾、聂树人等革委会领导对待持不同意见群众的不民主和打压，蔡派的反击被扣上了“反革委会派”“颠覆红色政权”“二流派”等帽子，也从此开始了蔡派与革委会的主要领导者和“革委会派”的纠葛。1968年8月军宣队、工宣队进驻夺权，不久东方红公社被解散，革委会被改组，3、4、5年级学生被分配，王大宾、聂树人在办完学习班后也离开了学校，地院再也没有了往日的喧嚣，毛泽东终于把自己烧起的这把大火在烧了两年零三个月后给浇灭了。

【故纸堆】

接见北京地质学院东方红公社部分同学的讲话

戚本禹

1967. 03. 05

按：本篇原载宋永毅主编《中国文化大革命文库》光盘（香港中文大学中国研究服务中心 2010 年版），原件来源：1967 年 4 月北京玻璃总厂红卫兵联络站编《中央首长讲话（3）》。现经蔡新平作了三处重要修订，修订文字以加下划线的粗楷体显示。

〔时间：凌晨。北京地质学院东方红公社部分同学出席。戚本禹同志首先向我们介绍了参加市委夺权委员会工作的周景芳同志。委托周景芳帮助地院东方红筹建革命委员会。戚本禹说以后周景芳同志负责和地院联系。〕

戚本禹问大家：你们地院东方红的大旗倒了没有？（同学答：没有！有的答：要垮了！）。杨雨中给你们传达过没有，江青同志说过地质东方红的红旗不能倒，还有北航红旗，新北大，清华井冈山，师大井冈山，江青同志说红旗不能倒，你们在文化大革命中立下了丰功伟绩嘛！在北京和全国是有影响的，你们一定要将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

同学说：我们认为朱的错误和李洪山有本质的区别，他是有错误。

戚：是有严重错误。

同学：他们一开始就要砸烂朱成昭的狗头。并且扬言还要在全国展开批判，这实质是对中央文革施加压力。

戚：周永璋来了没有？（没有）为什么没有来？（有人答：少一个不更好吗？）这是什么意思？周永璋、蔡新平以后不要叫他们托派了。你们有多少人？（殷：我们只有四个人，现在他们把许多东西强加在我们头上。蔡：支持我们，和我们观点相同的人很多，差不多每个班，每个教研室，每个系，都分成两派，并不是我们四个人。）问：你们经常给红旗杂志社送材料的是谁？（林嘉康：是我们“丛中笑”，我们二人——指吴清远。）

孟繁华来了没有？他不是写了篇很有名文章？孟繁华不也能当领导？孟繁华你可以协助王大宾工作嘛！王大宾是一个好同志。（同学插话：孟现在三司。）孟可以回来参加东方红的领导。你们还有哪些同志可以组成坚强的领导核心。（同学提：黄瑞华，田春林，朱德瑜，伏庆是……）他们原来是核心组吧？（是。）那黄瑞华你们可以出来吗？（他现在靠边站。）怎么能靠边站！应当靠前面站，站在最前面。你们计划整风到什么时候？（不知整到哪天。）被朱成昭这个问题纠缠住了。朱成昭，我刚才建议他闭门思过，给他一个改过的机会，我们党的方针是“惩前毖后，治病救人”嘛！当然他坚持自己的错误不放，那就滑到茅坑里

去了，蒋良补、杨雨中，他们两个检查得好也可以选一个当领导嘛！孟繁华你应当和广大东方红战士站在一起，去实践你的理论，要把东方红搞好！不要搞垮！

（蔡：王大宾，李贵，孟繁华我们同意，其余的同志我认为要经过大家的讨论。）

戚：东方红核心组应当站出来领导嘛！

（整风从 12 月开始，特别是朱成昭问题出来之后，我们和他接触很少，我们对二进地质部的看法是有成绩，有错误，现在要进行总结。）

戚：你们有什么分歧？（殷：策略上分歧。）二进地质部的成绩是巨大的嘛！我建议，你们何长工没打倒，以前的事情，即使有缺点，错误也不要讨论，这样有好处。二进，三进地质部是对的，在整风中应当多讨论当前的，你们抓一小撮没有？把同志叫成托派是错误的！

蔡：我们怀疑朱成昭是个野心家，他把持有不同意见的人都打下去了。

戚：听说周永璋在组织什么第四司令部，和三司对抗，有没有这回事？

蔡：没有，他们拿不出一点可靠的证据，那是很早以前，曾和聂元梓和刘富元搞北京公社。

戚：我掌握的一些材料，他和刘富元搞得很紧。

蔡：周永璋是和刘富元比较密切，但是我们一直是和刘富元作斗争的。

戚：当初三司开除周永璋的作法是错误的，但是后来他们作法也是错误的，请你转告周永璋，如果要组织第四司令部，是极端错误的。王大来了没有？他应当回到官道公社去。（有人插话：他本来是我们学院的老师。）他现在工作在哪里？户口在哪里？（官道公社。）那就应当回本单位嘛！学生串联都回去了，农村的当然也得回去，你们也不要给他加什么投机分子的帽子。

蔡：朱的思想为刘、邓、陶服务的，要整风又整不下去，我们要求在最快的时间内将整风结束。投入战斗，干部问题是不正常的，主要有宗派主义在作怪，把斗争矛头指向那些被工作队打成反革命的同志，这实质上是在为刘、邓、陶服务的。

朱：我们和他们在整风上分歧是，我们认为整风是一个普遍的马列主义教育运动，而他们认为炮轰总部，是夺权！

戚：他们要夺权，如果只夺你的权可以嘛！你的权就是要夺嘛！如果要夺王大宾、李贵等同志的权那是错误的！

以后谁要再走就要让他走，走一个少一个，走十个才少五双。阎长贵的讲话还是好的，我希望你是搞团结，而不是搞分裂，在这无产阶级革命路线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决战的关头，谁搞分裂，谁犯错误，搞小分裂犯大错误，搞大分裂犯罪！

下面我给大家谈两个问题：

一、你们要紧紧跟着毛主席、要相信毛主席，热爱毛泽东思想，永远跟着毛主席的革命路线和毛泽东思想，你们总部个别领导人在短时间内对毛主席的革命路线发生了怀疑，发生了动摇。我们不能紧跟任何人，要紧跟毛主席，要永远紧跟毛主席，要相信我们的伟大舵手能够领导我们将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有两种革命家，即小资产阶级的革命家和无产阶级的革命家。小资产阶级的革命家在关键时刻他就动摇了，无产阶级的革命家从不动摇，不怕挫折。小资产阶级革命家只要碰到一点小小的风浪就大喊大叫起来，他们没有见过大风大浪。不知你们地质东方红有没有这种人。见了一点问题就像天要塌下来了，惶惶不可终日。我们要向毛主席学习。解放战争的时候，胡宗南重点进攻陕北、山东，那是一个转折点，决战的时候，那位自称“刘克思”的人，内心惶惶了，当敌人刚进瓦窑堡，他就要叫赶快走，有的人在毛主席还没走以前，他就先走了。毛主席非常沉着，当时江青同志，骑着马跟着毛主席打游击，在山上和敌人兜圈子，有时主席刚刚离开四个钟头，敌人就到了，而敌人刚刚离开两个钟头，又回去找遗失的东西。粟裕在山东牵制敌军，事后刘邓大军（主要是刘伯承同志）南下，直插大别山，敌人就全面崩溃了。就像下棋一样。当时宋子文一看大局已去，就跑到美国去了。这个时候，不光是资产阶级革命家，就是小资产阶级革命家也要动摇了。也要大喊大叫。你们学习过《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毛主席从来对群众运动是满腔热情，正确地看待群众的缺点。巴黎公社诞生之前，马克思认为时机不成熟，当巴黎公社诞生后，马克思不是指责，而是满腔热情地歌颂她，支持她，在巴黎公社失败以后，没有指责不听自己的话，而是积极地总结了巴黎公社的经验教训。列宁吸收了这些经验，在十月革命之前写出了《国家与革命》这部光辉著作。农业合作化，人民公社的缺点，毛主席最先看到，最先指出，但是他并没有指责群众：当时你为什么不听我的话。俄国有个普列汉诺夫，是在 1905 年革命以前，是支持武装革命的，但失败以后，他就指责武装革命是错误的，这就是机会主义，就是右倾机会主义。

我们要学习毛主席鲜明的阶级观点，强烈的阶级感情，在毛选的第一篇，就是谁是我们的朋友，谁是我们的敌人，这是革命的首要问题。现在有些人对待敌人可以温情主义，敌我不分，而对曾和自己并肩作战的战友千方百计想把他搞臭，这不是无产阶级革命家的态度，你打游击，对革命的同志打游击，你有意见可以提嘛，这枪口究竟是对谁？可以写信嘛！我们不是不听，把并肩作战的同志搞臭，对喊“刘少奇万岁”的人却很感兴趣，为他们喊冤叫屈。当然反过来，对犯错误的同志又采取一棍子打死的态度也是错误的。

今天，茅坑边沿的当然应当帮助他，如果他转化为敌人，就不能温情主义，今天是我们的战士，明天他跑过去了，就要调转枪口向他开枪。对于动摇的，不

能把他推过去，如果他真要跑过去，就开枪。阶级斗争就是复杂的，大家可以好好学习毛主席著作。主席对敌人毫无温情主义。《论人民民主专政》一文中说：你们说我们独裁，我们就是要独裁。对自己的战友，你看那些电报，都是满腔热情，我们只有紧跟毛主席。毛主席教导我们要做冰天雪地里的梅花，像她那样立场坚定。冰雪对花来说，是一个相当大的压力，但她顶住了。我们要能顶住冷空气的侵袭，不致因你弟弟给你吹点冷空气就动摇了，女朋友，再有些其他的人，再给你灌点就耳朵软了，不要吃了迷魂药不知家在哪里。不管你吹多少冷空气，多大压力，多少冰雪都要顶住，你吹你的冷风，我开我的花。在整风中应以毛主席为榜样，向毛主席学习，紧跟毛主席。

二、学校的运动怎么搞？

首先让整风继续下去，把整风搞好，我不赞成用很长的时间来整风，你们用了这样长的时间来整风还没有整好，这和整风的方法有关。在整风方法上，你们不合乎毛泽东思想，是用宗派主义整宗派主义，小团体主义整小团体主义，以“私”字整“私”字，而不是用“公”字整“私”字。

我建议在整风中要学习文件，学习主席著作，学习最近《人民日报》发表的《鲁迅兵团向何处去》这篇文章。这是一篇活学活用主席著作的好文章。

现在你们自己有几派，**蔡新平，你可以自己组织自己的人整风，（蔡：我们是认识的不同，但我们都是东方红的，是内部的分歧）**当然，如果蔡新平要求也可以大家一起整风。整风中首先应当严格检查自己的错误，这是今天我所不满意的。东方红的同志要听蔡新平的意见，哪怕是有 5% 的正确。我们应当高价收买批评。要像战国吕不韦那样，把九千两黄金挂在城门上，只要你能给我改一个字。你们像这样下去，自己压制群众，老虎屁股摸不得，自己将来也会走上刘邓路线上去。朱成昭就是这样，刚愎自用，总以为自己高明，比中央文革还高明，比江青同志也高明，当然也还有个限度，没有说他自己比毛主席还高明。正是那所谓的“高明”，其实并不高明。

你们整风我建议你们用一个礼拜，或占十天的时间，用二天的时间学习文件，三、四天提意见，自我检查，人大比你们闹得更厉害，打得头破血流，你们还没有被传染，还比较文质彬彬。你们要搞三结合，搞革命的三结合，建立全院性的领导机构，然后再搞院内的斗、批、改，毛主席的一贯精神是坏人总是一小撮，刘邓才是扩大打击面。打倒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不是光靠喊口号就能打倒的，必须讲事实、摆道理、以理服人，把人说服，把他批得体无完肤。你们学生不能老是放假闹革命，恐怕过三个月后还要复课闹革命。资产阶级的东西要打倒，无产阶级的东西要建立，你们有什么打算没有，怎么个改法？改了然后就可以下厂下乡。

（这时有的同学提出不要整风小组时）戚本禹同志说：你们东方红核心小组自己决定，我预祝大家整风能够成功！